

黃季陸著

我們的總理

國史館印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們的總理

目錄

前言	一
一、首次謁見 總理——鄉下娃娃所見到的大英雄	二
二、可笑的軍事特派員	五
三、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幕	七
四、總理給我上「最後一課」	一〇
五、臺灣同胞對 總理的崇敬和愛戴	一三
六、仁愛與寬厚的胸懷	一八
七、博覽羣書，好學不倦	三〇
八、嚴守信誓，篤重情感	三六
九、崇尚學術，尊重學人	四四
十、平凡中的偉大	五一



我們的總理

黃永隆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革命實踐講習班講述

孫中山先生是我們中國國民黨永久的總理，也是我們中華民國永久的國父。總理逝世已經五十四年了，但他的精神、思想、人格和志業，却如日月經天，仍然照耀在人間，指引我們奮鬥前進。尤其使我們感到興奮和鼓舞的，總理逝世時遺留給我們的未完成的革命志業，已由他在世時患難相從，視若股肱，逝世後繼志述事，薪火相傳的先總裁蔣先生繼承下來，經過半個世紀來的艱苦奮鬥，已將總理的志業大部完成，並將其思想學說，發揚光大。所以我們一想到首創革命大業的總理，就同時想到繼承革命領導重任的總裁，古人說：「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我們對於總理和總裁這兩位近代的聖哲，真是有一種情不自禁，發自肺腑的崇敬之感。

今天我們的課程定的是「我們的總理」，其主旨自然是加深我們對總理崇高思想，偉大人格和光輝勳業的認識，從而作真誠的服膺與切實的實踐。據我所知，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是在大學裏講授中國近代或現代歷史的青年學者，對總理的思想學說和事業，自然已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所以，我今天不想去闡述總理革命的理論，也不想述說總理全部的革命歷史，而是要就我個人早年追隨總理所親自經歷與體察到的一些總理的人格、風範和行誼，向各位青年同志作一個歷史見證的報告。預定報告的內容是：

一、首次謁見總理——鄉下娃娃所見到的大英雄

二、可笑的軍事特派員

三、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幕

四、總理給我上最後一課

五、臺灣同胞對 總理的崇敬和愛戴

六、仁愛與寬厚的胸懷

七、博覽羣書，好學不倦

八、嚴守信誓，篤重情義

九、崇尚學術，尊重學人

十、平凡中的偉大

現在就依據這個順序，開始報告。

一、首次謁見 總理——鄉下娃娃所見到的大英雄

我第一次看見 總理是在民國二年春天，我初次由四川到達上海，是由黃復生大哥引我去瞻仰他的。那時他辭去臨時大總統後訪問日本回國沒有多久，我是由四川出來的鄉下娃娃。在未見到 總理以前我總以為這位推翻滿清、創建民國的大英雄，必定是像我在小說中所熟悉的那種「八面威風」的人物。聽復生大哥說要帶我去見他，雖然感覺十分欣幸，但總不免有些膽怯。及至見面以後，第一是覺得他穿的是洋服，很神氣；因為在民國二年時的四川，是很少看見人穿洋服的。第二是覺得他十分和氣，使我不感到拘束和畏懼。第三是當復生大哥為我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紹，稱讚我十二歲就參加革命，是辛亥革命四川保路運動小學生保路同志會會長時，總理笑了。他用手在我的頭上輕輕的拍了兩下，並說：你從此要好好用功求學，學成之後再來革命；沒有學問不能對革命有大的貢獻的。我當時對總理的話似乎不甚了解，迨至五十年後的今日，才知道他這段話的重要，才知道今日我在作事爲人方面偶一遇到困難時，便感覺到不能忍受，不是「怨天」，便是「尤人」；不是憤怨，便是悲觀的緣故；實則這些都是緣於學養不够所致。總之總理那時不是鄉下娃娃所想像中的大英雄的樣子。畢竟那時我才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怎樣能够了解總理的偉大呢？

復生大哥事後問我見到總理後的感想如何？我說：「總理嘴唇上的八字鬚子最神氣！」復生時時引此爲一笑談，到我成人作事時仍常常提及。在沒有和總理見面以前，就憑自我的想像推想總理儀容的人一定很多，據我知道的，吳稚暉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在吳先生寫的「總理行誼」一文中就會有過一段極有趣的話；吳先生說：

「……是一九〇一年，總理三十六歲，我是三十七歲，在南洋公學做教習做膩了，也願意到日本去留學，鈕惕生先生是我南菁書院的老同門，他在湖北陸軍學校，自費到日本想進士官學校，同住在東京神田區的明凌館。……一天有一位學農科的安徽程家樞（一個最大膽粗莽的革命黨，民國三年被袁世凱騙了，殺在北京彰儀門。）又有一位成城學校的吳祿貞，來尋鈕先生，要邀我同到橫濱去看孫文。我雖不會駭了一跳，暗地裏吃驚不小。其時聽見孫文與梁啓超，都在橫濱上下其議論。我說：梁啓超我還不想去看他，何況孫文。充其量，一個草澤英雄，有什麼看頭呢？他們三人微笑而去，約我下午在淺草上野公園精養軒候他們回來同吃晚餐。他們傍晚果然回來了，我馬上就問孫文的狀貌，是否像八蜡廟裏的大王爺爺，魁梧奇偉麼

？」

就連早年的吳稚暉先生，對中山先生的狀貌也曾有過如此不倫的假想，其他的人就不用說了。可是，從吳先生下面的一段話中，我們就可知道見過總理的人又是怎樣的看法：

「鈕先生說：你大大的錯了，一個溫文爾雅、氣象偉大的紳士。程（指程家樅）是已經來往得好久的，說道：你不相信他是革命的領袖麼？我說與梁啟超比如何？程搖頭道：梁是書生，沒有特別之處。鈕屢說道：你沒有看見，看見了一定出於你的意料之外。其時，鈕先生以書院有名的學者，被梁鼎燾所賞識，介入湖北陸軍學校，與後來申報主筆陳冷血，梁所稱為『二難』，亦受到張之洞看重。我就問他：梁鼎燾是頑固人物不必論，難道孫文就有張之洞的氣概麼？他說：張之洞是大官而已，你不要問，孫文的氣概，我沒有見過第二個。」

吳稚暉先生直到一九〇五年才與總理在倫敦見面，那時總理四十歲，是從法、比、德到英國，打聽到吳先生在倫敦的寓所後去拜訪吳先生的。總理給吳先生的印象是「一個很誠懇、平易近情的紳士。然而只覺是偉大，不能形容的偉大稱為自然偉大，最為適當。」

吳先生見過總理以後所說的話，我後來和他有同樣的感覺，清儒章實齋曾經說過這樣的幾句話：「學於聖人者斯為賢人，學於賢人者斯為君子，學於衆人者斯為聖人」。那就是說：賢人是從聖人那裏學來，君子是從賢人那裏學得，至於聖人便是從衆人中學會。如果說聖人是人格最偉大典型，總理便是最偉大的當今聖人，他的最偉大處便是在於平凡，也正是吳稚暉先生所說的「自然偉大」。

二、可笑的軍事特派員

我從辛亥年，以一十二歲的小學生參加四川保路運動後，黃學典三字（我早年的學名）在社會上已漸爲人知，於是使我一味地愛慕虛榮以奔走爲樂，根本不知道學問的重要。一些關心的同志們却很爲我因此失學而憂慮，並常常引古人「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話來激勵我。由於我的領悟和他們的幫助，才得離開四川到南京上海去求學。在上海先是進南洋中學，後又轉入復旦公學的中學，好不容易到民國六年才畢業於復旦，完成了中學的學業。時值督軍團叛變，張勳擁清帝溥儀復辟，民國的前途又步入一個更艱險惡劣的境地，於是我又靜極思動，去到廣州。由謝慧生先生（謝先生名持，後來在總理任非常總統時期擔任總理的秘書長。）引我去晉見總理，當時總理已就任護法軍大元帥職。在見總理之前，模糊中我不禁想起民國二年總理訓勉我要好好用功讀書的話來，恐怕他不同意我去參加實際工作。所以我見到總理時，便先向他報告我已在復旦中學畢業，正準備要到國外去繼續深造，在未出國前，希望能有機會在工作中討些經驗。總理聽到我的話後，沒有再談到讀書的事。因爲那時川、滇兩省的護法軍事正積極進展，要派幾位軍事方面的人才前去協助，同時因張午嵐在川邊的寧遠（即後來的西昌）獨立，被委派爲靖國軍第七軍軍長，亦正須給他送委任令去。因爲我和在四川主持軍事的熊克武暨復生兄都很熟，所以總理要我帶着幾位軍事人員前往四川。於是我亦和幾位軍事方面的同志一樣被派爲軍事特派員。臨行時，總理對我說：「你把他們帶到四川以後，再出來繼續唸書，你們四川人中有位任鴻雋同志在科學上已經很有成就，他也是參加辛亥革命以後才到美國去求學的。」

我們一行到了雲南邊境，始獲知張午嵐已被叛軍所殺，寧遠方面情況不明，其殘餘部隊由黃斗寅兄率領，現

駐紮滇邊的永北縣境。斗寅兄亦爲我所熟識，我們就趕到永北和他見面，然後由永北折回昆明。在昆明得唐繼堯之弟唐繼虞的協助，才輾轉到達成都。我的五哥當時正服務成都官印刷局，見我回到四川，當然十分高興，尤其覺得我是 總理委派的軍事特派員，引爲家門的一種榮耀，就在他所服務的印刷局裏自動爲我印了一盒名片，上面的官銜是「大元帥府軍事特派員」，碰巧當時擔任四川督軍的熊克武到官印刷局去參觀時看見了這一名片，便大發牢騷攻擊 總理道：「中山作事太輕率，季陸這樣年紀輕輕的人也配作軍事特派員？」此外還說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對 總理非常不敬，我聽到後十分憤怒，便不辭而離開成都去到重慶。本來熊克武早已允諾資助我一筆錢出外留學，我此時亦在所不顧了。時復生大哥在重慶擔任四川靖國軍總司令，我到重慶後就把熊克武的話告訴他，他很溫和地安慰我、鼓勵我並替我籌劃到上海或日本去繼續深造。

民國六年到川滇的一段經過，我從未向人提起過，當時同行的幾位同志的姓名亦不復記憶。最近我偶然翻閱張其昀先生編訂的國父全書，在該書的文電一類中發現一封 總理拍給雲南唐衛戍司令的電報；電報內容如下：

「雲南唐衛戍司令鑒：前派委員鄧天翔、陳得尊、黃季陸、溫宗鎧赴川，現留滇境，請由尊處加給護照，俾早成行。孫文。魚。請轉張左丞君，馮君到，函悉。請仍留滇，所需款稍緩當滙。文」。

這封電報的日期爲民國七年一月六日，應是我們一行由永北回到昆明的時候，同行的幾位同志的姓名亦赫然在目，使我又重新憶起這一往事。（在國父全書中的這一電文的標題爲：「致唐繼堯囑給鄧天翔等赴川護照並轉囑張左丞仍留滇電」。據我所知，當時在昆明的唐衛戍司令爲繼堯之弟唐繼虞，時繼堯督師遠離昆明駐在貴州的畢節，在此代爲更正。）

我在前文中提到的黃斗寅、黃復生兩兄，斗寅是辛亥前京津同盟會的主幹，復生則是同汪精衛於民前二年，

在北平甘水橋謀炸攝政王載灃的人物。他們在革命黨中的歷史較我爲久，年齡亦比我大，在黨內同志中，我們三人被稱爲「四川三黃」，斗寅爲老黃，復生爲大黃，我爲小黃，因爲我們之間親密有逾手足，別人常常誤會我們是一家的兄弟，其實斗寅是四川長寧縣人，復生是隆昌人，我是敘永縣人，雖然同姓，却不是同胞弟兄。

這是我第二次晉見 總理的經過，對他的偉大人格也才開始有了較爲深刻的認識；這次我對他的認識是：第一、是他慈祥愷悌的儀容，和待人的親切誠懇，使你感覺到和他之間沒有什麼距離，使你暢所欲言。第二、是他對革命滿懷的樂觀和希望，雖然當時他的處境非常惡劣。第三、他對青年人是那麼的看重。第四、他談話的語調，雖然平淡而清晰，但在問題的關鍵所在，總是那樣的剛毅果決富有信心。總結一句，我當時所意味到 總理的偉大，是在於平凡，是富有人情味，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中的偉大人物是如何的威嚴、崇高和特殊。就是這些平凡的地方已够使青年人感動了。

我後來入世愈深，接觸面愈廣，會晤的當今人物愈多，愈使我回憶到他的偉大。本來一個偉大的人物，並不是一定與常人有着甚麼特別差異的地方，差異的發生是在於他能身體力行的做得到，而常人則不身體力行的去做。所以我說 總理的偉大在於平凡。

三、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幕

民國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 總理在世之日親自主持的惟一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我以加拿大總支部選出的代表身份回國參加，因而有更多接近 總理談論問題的機會，印象太深了。

在我的記憶中，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典禮的訓詞，就是一次令人難忘的講演。他說：

「這次大會是本黨民國以來的第一次，是我們幾十年來革命黨人流了許多熱血和心血，犧牲了無數的聰明才力換來的日子」。

大會是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開幕，所以他說：

「革命黨推翻滿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湖北武昌，那天的日期是陽曆十月十日，是一個雙十日。今天是民國十三年的一月二十日，又是一個巧合的雙十日，所以這個會期與武昌起義的日期有同樣的歷史意義。」大會代表聽了這段話之後，頓覺心情開朗而愉快。說到此地，他的語音忽又轉得很沉重的說道：

「過去革命失敗的最大原因，是當時革命黨人外面見到外國的富強，中國衰弱，被人凌辱；內面受到滿清的專制，做人奴隸，幾幾乎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革命黨人發於天良，要想救國救種，便非革命不可。但革命何時成功？成功以後究用何項具體計劃去建設國家，大家都不加注意，只憑各人良心的驅使，不計成敗，不惜犧牲去奮鬥，所以造成各自為戰，沒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的局面。辛亥雖推翻了滿清專制政體，然到今日民國成立了十三年，革命仍無結束，仍然是失敗！所幸我們現在還有廣州一片乾淨土，有機會來集合海內外同志聚集一堂，共商今後革命的大計。我們從前沒有想到召開這種全國代表大會來研討革命和黨務進行的重要，是因為我們受了滿清官僚餘孽的欺騙。辛亥武昌起義因為革命成功得太快，從前反革命的官僚，也偽裝成革命黨，滲透到我們黨裏來，一部分同志受了官僚的包圍，中了官僚的毒素，便種下了我們革命失敗的總因！」

總理說到此時，態度顯露出十分的嚴正。他一再的反覆重述：

「這是我們過去失敗的總因！這是我們過去失敗的總因！」

總理的聲調頓然宏大起來。然後他又從容的繼續說道：

「官僚拿什麼來欺騙我們呢？他們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既然革命黨消，便只有官僚和軍閥的世界，沒有革命黨人的立足點了！到了今天我們才覺悟了，我們才知道這句話的危險，所以我們今天要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成。』來恢復我們革命黨的精神，來挽救從前的失敗。我們要改造國家：第一要有一個堅強的革命黨；第二要有很正確的共同目標。從前我主張以黨治國，現在想起來實行這句話為時尚早。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混亂，社會還是退步，所以我們國民黨今天的責任還是要先以黨建國，才能說得上以黨治國，國都建不起來，何能求治？現在中華民國的國基尚未鞏固，我們必須要另下一番功夫，把國家再造一次。這個把國家再造一次，使國基鞏固起來，便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他又說：

「我們這次的大會不是尋常的懇親大會來聯絡感情，不是尋常的討論會來議決例行事件，而是把我們幾十年來所得的經驗和發明的種種方法，在此國內外情勢大有可為的時候集海內外同志代表，把這些經驗和方方法提出來供大家採納。我們在大會之前已經組織了一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做了一番準備的工作，自今日起要把籌備的各項方案計劃，逐日提出來供大家討論研究，要大家贊成這些方案帶回去實行。那麼，本黨一定發展，革命一定可預卜成功！」

總理說到這裏，以很重的語調，總結此次大會改組的意義：

「第一是把本黨改組成一個有組織、有紀律、有力量的革命黨；第二是用本黨的力量去改建中國。」

「除了上述兩件事以外，另有一件大事要大家特別加以警惕，那就是本黨從前不能成功的原因，不是敵人有什麼大力量來打敗我們，而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我們此後要團結一致，把自己的聰明才力貢獻到黨內來，不可歸個人所用，要歸黨內所用。大家團結起來為黨為國，為同一目標為同一步驟而奮鬥！革命成功最要緊的條件是全黨同志精誠團結，團結的要義是：第一要犧牲個人自由；第二是要貢獻能力，然後全黨才能有力量，等到全黨有了自由有了能力，才能擔負革命的大事業，才能改造國家，實現國家的自由。本黨以前的失敗是各個黨員有自由，全黨無自由，各個黨員有能力，全黨無能力，我們今日改組便要先除去這個毛病。我們應當反省，應當補過，為今後的革命成功而奮鬥！」

聽眾以感慨奮勉的心情，聆聽 總理的講話。這時整個會場如嚴冬深夜那樣靜寂，而每個人的內心，則燃燒得像火一般的熱烈，最後爆發了如雷的掌聲，經久不歇。

大會會期為十天，討論的重要問題很多，如總章中的跨黨問題、比例選舉制問題、反帝國主義綱領問題，以及大會宣言中的政綱問題等，都具有深遠的影響。特別是比例選舉制和反帝國主義綱領問題，在討論期間及通過之後，我個人都從和 總理的談話中，得到最大的啟發和深刻的教訓，令我畢生難忘。這段寶貴的史實，我已發表在「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專冊中，各位同志可以參考。

四、總理給我上「最後一課」

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北方發生了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人所發動的「首都革命」，總理應邀北上共商全國和平統一。當 總理由韶關回到廣州準備離粵北上之際，被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所驅使，使我決心去看他

——雖然我知道他十分忙碌，而我又染疾初癒只能緩緩步行。那天我振作起精神從頤養院乘電船到達位在廣州河南的大本營碼頭，不期與吳鐵城先生相遇，於是就同吳先生邊談邊走的走向大本營。他好像忘了我是大病初痊，步行甚速，使我很吃力的才能追上他的步伐，到達大本營後他就和我分手，我在大本營樓下好不容易才喘息過來，慢慢地扶着欄杆爬到樓上去，當我步入 中山先生客廳門口，把頭越過屏風向內看時，看見 中山先生和程潛正在那裏談話，我馬上把頭往外縮，不願意打擾他們。不料 中山先生已經看見我了，便叫我進去，以很驚訝的神氣問我道：「你的臉色為何如此蒼白？身體為何如此瘦弱？你害過大病嗎？」我恭敬的答道：「是，我剛剛從醫院裏出來，害的是嚴重的傷寒症，經過了一個多月病魔纏繞，近幾天才能勉強走路，聽說先生要北上，特來請示大本營法制委員會的工作此後應當如何進行。」總理道：「你所說的傷寒症是不是英文的Typhoid Fever？這一病症患了很嚴重，應好好當心，多多休養。」他慈祥愷悌地關心一個青年人，真誠有如慈母，令人至今追思懷念。總理命我搬一把椅子，對着他和程潛所坐的蘇發椅子的中間坐下，中斷了他和程潛的談話，而問我要問的是些什麼。我看當時 總理的神情好似程潛正向他要糧要餉而不得解決，我的到來好像是解救了他那時正擺脫不了的困擾似的。這是最稀有的一個機會，也是最後的一個機會親聆他的訓誨，自此以後雖仍看見過他幾次，但已不能親切面聆他的教訓了！

總理說：

「這次北方的同志推翻了曹吳軍閥，國家又呈現出一個統一建設的機會，我這次北上要促進國民會議的召開來廢除不平等條約，以謀國家的獨立；要把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政綱提到國民大會予以通過，來重奠國民革命的基礎。」

我忽然插嘴問道：

「爲什麼把本黨宣言政綱提交國民會議通過便叫重奠國民革命的基礎呢？」

總理答道：

「宣言政綱現在只是本黨所決定的，是我們一黨的宣言政綱，實行的責任只在我們一個黨，經國民會議通過之後，便成爲全國國民的政綱了，全國國民便都有責任來實行，這就是重奠國民革命基礎的意義，也可以說是擴大國民革命的基礎的意義。」

我聽了 總理這一精闢的議論，忽然明白政治學上的由事實的政權通過到法律的政權的微妙之所在。

總理繼續又問道：

「目前建國大綱已經公布，正廣大徵求各方的意見中，你有什麼疑問嗎？現在我們要準備新國家的建設了，法制委員會最好根據建國大綱，制訂一套地方自治實行的計劃和法規，以備將來之用。」

說到 總理手訂的建國大綱，我至今真是感覺慚愧，建國大綱制訂於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我當時並未加以重視，等到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布，我適在病院中，在寒熱退後才有機會加以逐條略爲研究。總理問我有什麼疑問時，我便一口氣提出了十八個疑難之點。實則建國大綱全文只有二十五條，我竟有十八個疑難之點提出，真所謂少不更事了。如果不是 總理寬大仁慈愛護青年，可能誤會到我有意與他爲難。我每一問題自信都不是泛泛的無的放矢，不是基於書本的知識，便是陳述個人獨特的見解，雖然那時還年輕，知識學問尙未到成熟的地步。總理在答覆我每一問題時都不厭其詳地爲我說得十分仔細，並好似鼓勵我暢所欲言的樣子。有時他抿着嘴，兩隻慈祥的眼睛總是盯着我微笑，好似今天非把我這頑皮的孩子說服不可的樣子。這是我一生中上的最最有意義

的一課，也是 總理中山先生給我上的最後的最難忘的一課。至今我心裏仍然存着一個疑問自己不能解答，我常常自己問自己，究竟那天我對建國大綱所提的十八個疑問是些什麼，我竟連一點也想不起來了，我常把建國大綱二十五條逐條細讀來回憶當日那些問題，但連一點影子都找不着了。我又常常清夜自己思量：我四十年前向總理所提出的十八點疑問，究竟是我那時的知識學問見解比現在高明呢？還是由於我現在的退步，以致再也尋找不出那些疑問來。我的答案是：那時我年輕幼稚沒有把它完全消化，現在我自然比當時成熟多了，所以便追尋不出那時我對建國大綱二十五條所提那些幼稚的疑點。的確，我們要知道 中山先生的學問思想，必須經時愈久，學養愈深才愈能發現其偉大的！

五、臺灣同胞對 總理的崇敬和愛戴

回溯臺灣與國民革命的歷史，應始自甲午（一八九四）。這年五月，總理會上書李鴻章謀政治之改革。及同年六月，中日戰爭爆發，隨後清海陸軍全敗，總理知政治改革之無望，於是前往檀香山，於是年十月二十七日（陽曆十一月二十四日）創立了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總理此舉，與甲午戰爭的刺激自不無關係。次年（一八九五）馬關簽約，割讓臺灣，總理亦決定於是年陰曆九月初九日在廣州發動第一次起義，同時也提出收復失土的號召。首義失敗後，總理即派興中會會員楊心如、陳少白先後來臺，並建立了興中會臺灣分會，淪陷不久的臺灣便已成為一個革命黨人活動的基地。

據可信的史料，總理曾蒞止臺灣三次。第一次是在庚子（一九〇〇）秋天，來臺策劃第二次起義——惠州三洲田之役；第二次是民國二年八月，二次革命失敗之後；第三次則是在民國七年五月護法遭遇挫折之時，戴季

陶先生隨行。由於這一淵源，臺灣同胞對於 總理的救國主張與崇高人格，都有相當的認識，也有不少臺籍志士謁見過 總理，他們都對 總理表現出無比誠摯的崇敬與愛戴，如羅福星就義前所寫的絕命詩中，就曾嵌以「中華民國孫逸仙救」八字，這種信賴革命領袖的眞誠是多麼感人！

最令人感動的，還是 總理於十四年三月逝世後，臺灣同胞所表現出的那種悲痛哀悼的眞誠。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求學和居留的臺灣同胞，都參加了當地追悼 總理的活動，北大臺灣同學會且曾揭出「三百萬臺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舍我輩其誰分擔！」的輓聯，這無異是皈依革命的宣言書。在臺灣島內的臺灣同胞聽到 總理逝世後，無不暗暗地洒淚，但他們在日人的統治之下，又不敢哭出聲來。臺灣的民衆團體有志社籌備了一個追悼會，訂於三月二十四日晚間七時在臺北文化講座舉行，文化講座的地點在今日臺北市的貴陽街，靠近第九、十號水門一帶，是夜大雨傾盆，街道十分泥濘，到會的無比的踴躍，但會場只能容納三千人，在開會半小時以前即告滿座，遲到的人只得在場外敬禮默哀而去。大會從晚七時至夜深十時無一人中途退場者。臺灣同胞舉行的這一追悼會，真是得來匪易，因爲當時日本人是反對臺灣同胞追悼 總理的，在開會的前一天，就傳有志社的幹事到警察署去訊問，命令他們把已經擬好的一份悼歌作廢，不准在會場歌唱，又不准朗讀弔詞，亦不准演講，控制刁難，無所不用其極。而臺灣同胞却仍在日人的高壓下，在暗夜的風雨中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壯烈的追悼會，是怎樣的難能可貴啊！

這一份被日本警察禁讀的弔詞，是臺灣同胞熱愛祖國、嚮往自由、崇敬 總理的心聲，弔詞的作者是在幾年以前去世的張我軍先生，亦即是最近由美返國的本省學人在臺大任教的張光直博士的尊人。這一弔詞雖然被日本警察署禁讀了，但它却很快地就傳到祖國同胞的耳朵裏，凡是讀到這一弔詞的人，莫不爲臺灣同胞愛祖國、愛自

由、崇敬 總理的至誠而感動。謹將這一弔詞錄在下面，以結束本文：

唉！

大星一墜，東亞的天地忽然暗淡無光了！

我們敬愛的大偉人呀！

你在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這時刻

已和我們永別了麼？

四萬萬的國民此刻爲了你的死日哭喪了臉了，

消息傳來我島人五內俱崩，

如失了魂魄一樣。

西望中原禁不住淚落滔滔了。

※

先生！

你在西紀一八六六年，帶着你

超羣的天才，

滿身的愛國愛人類的精神，

革命思想和實行的毅力，

深入我人類之伍以來，

※

※



前後六十年了。

你年纔入冠，便委身於救國運動和革命事業，
你在四十年的中間，

始終用了你的萬撓不屈的毅力，

你的表示始終一貫的精神，

來實行你千移不易的主義。

那專制橫蠻的滿清朝廷的迫害，

那無惡不爲的軍閥的壓迫，

那野心勃勃的外國帝國主義的嫉視，

終不能奈何先生。

※

你的精神，你的理想，

雖未十分實現，

但是，你的毅力意氣，

已推翻滿清，建造了民國，

嚇壞了無恥的軍閥，

和殘酷的外國帝國主義，

※

※



喚醒了四萬萬沉睡着的人們了。

※

※

可是啊！

三民主義還未實現，

中國的革命還未成功，

大亞細亞聯盟還未實現，

前途正乏導師之時，

你殘忍刻薄的死神，

你竟把這位千古不獲的導師，

奪到死的國度去了！唉！

※

※

中國的同胞啊！

你們要堅守這位已不在了的導師的遺訓：

革命還未成功，

同志尚須努力哪！

先生的肉體雖和我們長別了，然而

先生的精神，

※

※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先生的主義，

是必永遠留著在人類的心目中活現。

先生的事業，

是必永遠留著在世界上燦爛！

說到此處，我回憶到五十多年前，總理逝世的消息到達廣州時，廣東大學，亦即是後來的中山大學的情形，我記得當時在北方的北京大學教授們出版了一個刊物名叫現代評論，廣東大學的教授們出版了一個刊物叫社會評論，我們特為 總理的逝世出版一個專號，內容極為豐富。專號中的「中山先生事略」是我執筆的，「中山先生思想概觀」一文是周佛海寫的，「民族主義」一文是曹四勿寫的，「民權主義」一文是謝瀛洲先生寫的，「民生主義」一文是曾濟寬先生寫的，其餘的文章我已不能記憶了。當日執筆寫文章的人現時尚健存，而在臺灣的有謝瀛洲先生和我兩人。我當日寫「中山先生事略」一文，便決心要好好為 中山先生寫一本傳記，事隔四十年，我此一志願迄未能獲償，真是慚愧之極。謝瀛洲先生曾任最高法院的院長，他在寫「民權主義」一文時曾謂將畢生為闡揚 總理的政治思想而努力，他的確在過去的四十年中，在工作上和寫作上實踐了對 總理遺志述學的工作。第一部有關五權憲法的書是他寫的，此外他寫有「中國政府」、「中華民國憲法」等書，風行一時，闡述 總理的遺教，貢獻很大。至於我呢，匆匆五十多年，一無所成，每當肅立於 總理遺像之前，百感交集，慚愧無似！我今後果能擺脫俗務專心致力於 總理思想之研究與闡揚，藉以自拔並以補過嗎？

六、仁愛與寬厚的胸懷

凡是追隨過 總理的同志，都會體察到 總理的過人偉大之處甚多，而最重要的乃是他那充滿仁愛和寬厚的胸懷。日友宮崎寅藏曾以「孫逸仙其仁如天」為題目發表文章，盛稱 總理「其仁如天，其智如地。」美友林百克(Paul M. W. Linebarger)為 總理寫的「冊傳記」(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亦曾說 總理一生最偉大的地方是仁愛，而 總理不能親見中國革命的成功，亦可能是由於他太仁厚。

追隨 總理很久的加拿大人馬坤，因為仰慕他的偉大，自民國十年來到中國，一直作他的侍衛，到他的逝世為止。馬坤雖然是一位外籍的人士，知識學問並不太高，但他對於 總理的崇拜，有如耶穌那樣的人格崇高偉大，他說：「如果 中山先生要有任何缺點的話，那便是他過於仁慈，他竟不敢想像還有人對自己的國家犯罪。他曾經誤把一些專事謀取私利的人，當作了為國為民的人而加以信任。」最顯著的例子是：惹下了滔天大禍，甚至要謀害 總理生命的陳炯明，只要肯悔罪，亦可以獲得他的寬恕。的確，這一類的事，可以一面顯示他的偉大，一面亦可以顯示不肖之輩對於他的命令的玩忽而誤了不少的事機。我從一位識字不多，曾擔任 總理衛士的羅天民的口中，亦聽到同樣的感歎。

提到羅天民同志，使我想起一件令人難以忘懷的往事。事情是民國十八年春天的一個晚上，那時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先生在廣州東山的「退思園」大宴賓客，退思園類似一個俱樂部，在當時算是一所很够標準的洋房，管理也竭盡洋化，政府高級人員的宴會大半都借用這一個地方。正當賓客入座後觥籌交錯的時候，忽然一種叫罵的聲音自不遠的地方傳來，愈罵愈起勁，不聽人勸阻似的。賓客中有位曾是陳炯明的重要人員之一，此時也正是陳銘樞先生身邊最親信得力一員的某君。大家已很分明的聽到罵的人正指着此公的名字在罵，全座的客人均為之一驚。主人陳先生和某君本人當然顯得十分尷尬不安，大家靜下來只聽得罵道：

「某某：你是甚麼東西！」

「你是反革命，是謀害 總理的叛徒陳炯明的走狗！」

「你那配在此洋洋得意……」

主人陳銘樞先生發火了，某君本人則滿面通紅坐立不安。陳銘樞先生大聲叫他的隨從道：

「你們快去看誰在那裏罵人？給我趕出去，關起來！」

不久，陳的隨從回來報告道：

「是黃季陸先生的隨從羅天民」。

此時把我急了，這如何下臺！這不是大煞風景，令人難堪嗎？我於是說：

「他是不是吃醉了，是在借酒發瘋嗎？」

來人一點也不明白我的意思，爲我轉過彎來，仍然回答道：

「現在他們還不會擺飯，那來酒喝呢？」

我於是走到發出罵人聲音的那邊，很委婉而又嚴肅地向羅天民說道：

「天民同志！你今天有什麼不得意的事，在這裏發皮氣？有話回頭說好了，這樣多的客人在此，太不成話了！」

羅天民看見我，聽了我的話之後，才轉變怒氣爲祥和，把臉附着我的耳低聲說道：

「裏面的那個人就是某人，就是和陳炯明在一起謀害 總理的，我看見了他，火就會往上冒！」
我用手搖擺了幾下，暗示他不要再講話，他才停止不罵了！



原來羅天民這個同志，曾擔任過 中山先生的衛士，是由當日廣州公安局長歐陽駒兄派來保護我，跟隨我服務的。中山先生逝世之後，把他安頓在公安局裏擔任一個閑差事，大概也是由於他的皮氣不好，又因他曾跟隨過總理，別人不便冒犯他，所以才派來跟我服務，想亦是調虎離山，免去許多麻煩的意思。歐陽駒兄有一次告訴我說：

「羅天民這位同志真難辦，總是和人家合不來，說起來又是跟隨過 總理的老人，在機關裏總得講究體制，而他老兄一點也不在乎，我看除了跟隨你之外，別人一無辦法。你的度量寬大，一點也不在乎這些，你在黨裏的歷史又久可以制服他，所以我派他跟隨你。」

羅天民同志自民國十七年至民國二十五年我離開廣東，他一直跟隨我未曾間斷過，我們真是如弟兄般的親熱，有困難患難的時候，他那種真誠、負責、勇敢、義氣的精神，真是令人佩服。他除了這次在退思園罵人這件事，幾乎使我下不了臺之外，從來給我的都是幫助而不是麻煩。

我回到退思園原來的坐次之後，難以爲情的低聲向陳銘樞先生說道：

「這位羅天民是跟隨過 總理的老人，皮氣太壞，真難辦，請你們原諒。」陳銘樞很知趣，他說：

「不管這位老傢伙，我們大家吃酒吧。」他舉杯一飲而盡，我就此亦舉杯向某君乾杯，表示歉意。這件事總算如是下場，但並不是「盡歡而散！」

羅天民同志讀書並不多，寫普通的信都不甚通順，但他很留心時事，每天的報紙他是必讀的，每天和我談話的資料亦多半是他讀報的心得。因爲他喜歡談話，每和我談話都是隨我出入的時候，坐在汽車的前座。我感覺到他談話時要翻過身來滔滔不絕，妨礙了司機的駕駛，爲安全起見便乾脆叫他到後座來和我並排而坐。起初他不肯

，坐慣了後座，他又永不移到前座。雖然有時有二三客人應該和我一起坐，他亦當仁不讓了。一次有三個擔任重要職務的人員搭我的車，加上我和他共五人，後面實在擠不下，他又不肯讓，客人已經被我讓入後座了，我只好坐在前面司機的旁邊，請他坐在後面爲我招待客人。他此時似乎感覺到有點不妥當，堅持請我坐回來，他自此便一直坐在前面，並且亦不彎過身來和我多講話了。我疑心他對我生了氣，後來他老實的向我感歎的說：

「那天搭車的三個人中，有一個和我在大本營共過事，從前稱呼我是『大老』，自從他善於鑽營做了大官之後，當着人的面前，便作威作福，好像從來就不認識我姓羅的一樣。我既不向他借錢，又不求他什麼，那天我本想迫他坐到前面去，看看我同先生坐在一起的神氣，使他知道我姓羅的並不比他差什麼。到了您往前一坐，我又不能坐在後面，倒給那個『衰鬼』反覺得自己神氣驕傲一番，我實在感到難堪！」經過一番委婉安慰之後，他又滔滔不絕地談笑風生了。

羅天民同志是一位血性男兒，我疑心他是幫會中人，但却不會問過他，只覺得他交遊很廣，時時被人稱呼爲「羅大哥」而已。我有時和他去理髮或飲茶，多次被人把錢搶先付掉，人情究竟是出於他的朋友，或是我的朋友，我總不大分得清楚。他和我講述中山先生故事的時候，有時聲淚俱下，有時拍桌指定某人大罵一番，有時又歎息總理太仁厚，不該用某某人，不該把某某人寬恕，以致讓這人後來背叛革命、爲非作惡。除此之外他心目中的中山先生是偉大、仁慈、寬厚、愛護同志如家人一般。他一生引爲最驕傲的，最光榮的事，便是他口中時時說的「出生入死」追隨過總理的歷史。他不自覺他的地位卑小，他衡量自己的價值，是他追隨中山先生參加革命的歷史，並不在他官職的大小，地位的高低。

前面提到的那位贊助中山先生革命，並曾爲他作傳的美國人保羅林百克先生(Paul Linebarger)，他在未

和 中山先生見面以前，對於 中山先生的崇拜，是由於他在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七年間，任菲律賓巡迴法官時僱用的一個中國廚子而起。這位廚子名叫阿普，他不僅在平時服務周到，令他滿意，最使他感激的是一次輪船失事，阿普救了他的性命，成為他的救命恩人。在海上遇難救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險的人，才有這份勇氣。救得了別人自然是一件好事，救不成功時，說不定會與被救者同歸於盡。沒有見義勇為，冒險犧牲精神的人，是不會有此義行的。林百克先生說：「我後來決心贊助中國革命，畢生為 中山先生服務的原因，是由於這一位廚子恩人阿普的精神感召，因為我發現阿普是 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黨的敢死隊隊員，阿普後來離開了我回國參加革命，竟被滿清政府殺了頭，成為一個中山主義的殉道者。由於我與阿普的關係，我才知道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與計劃，使我自己亦變成了一個 孫逸仙的黨徒。」

林百克在他所著的「孫逸仙傳記」的序文中曾這樣寫道：

「在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七年間，著者在菲律賓任巡迴審判官的時候，雇了一個很好的中國廚子名叫阿普，他侍候得真是不差。另外有一件事使這種感覺進而為真的對於他的感激，就是因為有一次輪船遇險，阿普曾經拯救了作者的生命。」

被這個感激心所鼓勵，阿普後來說出他是一個 孫逸仙的敢死隊中人，又要借一筆款子回國。這一個要求是允許了，忠心的阿普就走他的路。後來帝制者捉到了他，加以極刑。這一樁悲慘的事實同阿普直接告訴著者 孫逸仙在中國建立一個共和國的計劃的話，使著者變成一個 孫逸仙的黨徒。這個受刑戮的廚子尚且有為他的領袖犧牲的勇氣，那麼享受自由權利而有提倡民治責任的美國人難道反不應當同情於敢死隊而予以助力嗎？所以著者就熱心於 孫逸仙的運動，雖是因為職業關係，不能直接參加。待辭去職務之後，就做幫

助孫逸仙的一個活動份子。」

林百克先生眼中的敢死隊中人阿普，我想可能亦是讀書不多，俠義型的羅天民同志一類的人物。

羅天民同志有一天對我說：「總理一生的失策是不殺人，有獎無罰，易受壞人欺騙。如果他能早日把那些壞人，如陳炯明及一些不肖之輩繩之以法，革命一定很早就成功了。」我答覆他說：「壞人是殺不盡的，只有用感化和教育的方法才能使壞人減少以至於沒有。」羅天民對我這一說法很不贊成，他很認真的對我說：「總理偉大的地方你不重視，失策的地方你反而如此感到興趣。」他舉出一個例子告訴我，證明他的意見一點都沒有錯誤。

他說：「在民國十二年十一月間，東江陳炯明的大舉來犯，總理由廣州親赴石龍前線督師，那時控制惠州陳炯明的一處天險之地飛鵝嶺已經失守，博羅縣城正岌岌可危，而滇桂各軍又遲遲不進。總理親赴前線督戰，於到達石龍後，即召集前線將領范石生、盧師諦等緊急會議。屬於滇軍的一個將領名叫蔣光亮的後到，總理命令他立即率軍前進，他對總理說：

『今晚我要回廣州去，明天再來。』

總理說：

『這是軍令，汝若擅離職守、貽誤軍事回到廣州去，我必依軍法從事。』總理的話雖說得十分嚴厲，但蔣光亮竟不顧而去。總理亦莫如之何，後來亦沒有把蔣光亮槍斃！」言下不勝感慨。

這一故事，說明當時外有強敵，內無可用之將的情形。這不是說當時忠肝義膽的人一個也沒有，而是說這樣的人可能是不多，有亦沒有力量；或者是不知，亦或是尚未顯露頭角。蔣光亮這一類的將領不止一人，當日霸據廣州最有力量的楊希閔爲首的滇軍和劉震寰爲首的桂軍，更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在行爲上幾乎如出一轍。在此種

困擾情形之下，平素以樂觀、積極和寬大爲懷的中山先生，便亦不免陷於困頓煩惱之中了。他之所以決心要改組他所領導的革命黨，和要從頭做起建立真正革命的黨軍來擔負起新的任務，都是由這些因素所促成。

總理有一次召集滇桂各軍將領講話，曾有如下的沉痛語句：

「滇桂軍各軍官！你們趕走了陳炯明，我是很感激你們的。當時我在上海沒有一點實力，原本不想回到廣州，只是想用心著書，把我的政見向廣東父老宣傳，後來你們都派人來到上海，歡迎我即時回到廣東，自誓要實心擁護我，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因此我才決意回來，誰知你們都是戴着我的帽子，來蹂躪我的家鄉！我是革命黨人，犧牲是不惜的。如果於國家有益，我就約同廣東的父老兄弟一起犧牲，也都是願意的！可惜你們把我的家鄉這樣蹂躪而於國是毫無益處，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塊辦事，我不得不和你們離開，我要回香山去了！」

總理這番沉痛的話，可以看出他當時內心的煩惱，在場的將領楊希閔、劉震寰等都裝着受感動的樣子，表示說：「大元帥何必生氣，你要我們怎樣，我們此後都服從你就是了！」於是總理便提出一項統一財政的主張來，當場大家都一致贊成。但是散會以後，依舊不能實行，各軍依舊分割防區把持稅收，肥區的軍隊飽得欲死，貧瘠區的饑得欲死，到底沒有辦法。

以上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總理當時在廣州一隅的處境是：外有強敵壓迫，而內部是軍令不行，財政紊亂，政治失序，人民把這些責任自然都歸結到革命政府的身上，自然會對革命政府日趨於失望與背離了。

人民固然不是怨惡孫先生個人，但在這一種情形之下造成的人民生計日蹙，社會秩序不安，敵人又時時來攻，召致毀滅的危險等等，假定長此繼續下去而無法改善，怨怒雖在對當時的腐敗顛覆的軍隊，責任則在總理

所領導的革命政府，總理亦將無以自解，以對廣東的父老兄弟。所以他警告當時的滇桂軍將領說：「你們都是戴着我的帽子來蹂躪我的家鄉，我是革命黨，犧牲是在所不惜的。如果於國家有益的，我就約同廣東父老兄弟一起犧牲，也都是願意的……」他的話是如何的沉痛！他的處境又是如何的艱難。

大家對於此種困境的造成，往往歸咎於總理過分寬大的性格；一是他太過於仁愛，因而使他領導的軍人放縱以至無所不爲；一是不嚴厲約束軍人，有獎無罰，不把那些違令犯法的人殺掉以整飭風紀。

以上兩個論點，片面看來都不無理由，但是從當日實際情形來看，則又有可資慎思的地方。

第一、在強敵壓境，東江有陳炯明叛軍，南路有鄧本殷、申保藩蠢蠢欲動，北方軍閥和外力所給予廣州的壓力尚且不計在內，在這一情勢之下，既爲時間不許，亦爲力量所不及，投鼠忌器，因應應付自亦有其必要。

第二、那時廣州是一僅有基礎，亦是僅有的小小憑藉，若並此而無之，亦是不合實際的。

第三、這些軍隊表面上都是一時赴義而來，他們對革命的了解既不够，對革命組織與訓練更談不到，當然對主義的信仰更無從說起了！

要挽救當時的局面，如果說殺人可以嚴申軍令，即令做到，亦於事實無多大補益。其根本所在，正如總理民國十三年六月在黃埔軍官學校開學典禮的講話中所說：

「……現在民國的基礎，一點都沒有，原因很簡單，就是由於我們過去的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爲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今天開這個學校的希望，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從新創造，要這學校的學生來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

歷史告訴我們，當日廣州微弱而紊亂的局面，能够終於打破的原因：一是建立真正的革命軍，而把青年學生養成爲革命軍的骨幹；一是建黨，使之成爲一個堅強而有紀律的革命團體，重造歷史的新頁。總理並沒有採用殺人的辦法去做這些事。相反的，蔣光亮這一類的將領，照理雖然該殺，但在當時的情形實亦有其不得已的必要，因爲當時面對的敵人威脅太大，稍一不慎便將失去僅有的憑藉——廣州。不肖的軍人如蔣光亮，究竟在那一時期內，比敵人總有利害與程度之不同。當然，蔣光亮這一類人隨時都可投向敵人，但是由於總理的寬容忍耐，他畢竟沒有投向敵人。因而總理能够獲一喘息機會，而把真正的革命軍和革命的基礎重建。總理一生，除了陳炯明不但要劫掠政權，而且要危害他的生命之外，叛變離異他的人畢竟很少，未始不是他這一寬大容忍的精神所造成。

革命是一種非常的歷史改變，亦是一項不同常情的因應藝術。他的第一步工作是在「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傳佈福音」與「教育人羣」，革命工作有如一種宗教的傳佈播種，他的力量是產生在影響與感化上，而不單在權力的制服與伸張。他有如創立宗教的教主，其任務在傳播福音，擴大影響，不一定要及身看到他的宗教的成功。而一個宗教的成功，亦往往在教主的身後才能實現，總理的情形自亦不能例外。我們若拿常情的功利主義眼光來論斷他的成敗，更是不合適的。

我在此不是要爲總理的過分寬容忍耐有所辯護，而是要說明他的偉大處亦正在此種地方。林百克先生說他偉大在於仁愛，不能及身而及革命的成功亦是由於他的仁愛。我只贊成他的前一種意見，而不贊成他以總理不能及身見到革命成功爲遺憾的後一種意見。因爲總理對於中國革命的最大貢獻是在披荆斬棘，爲後來的人開路，他不能及身見到革命的成功並不足引爲遺憾。一條長遠的路，要靠分段的走，要一個一個、一代一代的繼續努

力才能抵達目的地的。

總理恢宏的器度，仁愛誠厚的美德，在我看來；一是由於他的天賦使然，一是由於他對人對事的看法自有其哲理，很自然的支配了他的行為，不是勉為做作的。他之不贊成殺人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從以下的小事可以看出他所持哲理的一斑：

在民國八年一月左右，有一位革命同志王鼎，他寫信給總理，要實行暗殺來鋤奸救國，他在信中說：「救國鋤奸為吾黨應有之事，請派安人指示一切，倘得提携為最後之一簣功成，死當含笑，生當再接。」總理親批云：

「代答以暗殺一舉，先生向不贊成，則在清朝時代亦阻同志行此，以天下惡人殺不勝殺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張，積極之進行，則惡人自然消滅，不待於暗殺也。」

在有權力時不肆殺人，在秘密時期不贊成暗殺為解決問題的方法，那麼總理所持以解決國事和革命的進行之方針又是甚麼呢？在我看來，端在他所說「道在有正大之主張和積極之進行」一語。民國十二年春天，舊桂系軍人沈鴻英，於會同滇桂各軍趕走陳炯明出廣州之後，曾派人携函向總理輸誠，促先生返粵，並宣言竭誠服從命令，在沈鴻英來說，當時是一種緩兵之計，而總理明明知道他的用意不善，但仍然坦誠曉以大義，他回給沈鴻英的信上寫道：

「國家之事，須正當辦法，乃能得正當解決。絕非挾私任術，好逞陰謀與民治之道背馳者所能得勝。中間或能得一二勝利，結果亦終歸失敗，可以斷言，此古今中外之成例俱在，可資考證者也。」這一段語重心長的話，是總理對人對事之道的又一說明。

大約在民國二十一年春天，正當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在上海偶然的一個機會中，遇着一位性格粗暴的江湖人物王某，據聞他曾受人僱用從事暗殺；有「暗殺大王」的稱號，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述的招商局總辦趙鐵橋先生，據說便是此人受人利用，而把他暗殺的。王某對我說，他曾經參加過革命，親自見過中山先生，因此我便問他對於中山先生的印象，在他最崇拜中山先生的是甚麼？他很激動的說道：

「我有一次在法租界莫里愛路，總理的寓所去見他老人家，那時我實在太窮困了，我預備請總理發給我一點革命工作費，其實工作是名，救窮是實，他老人家大約亦是正在鬧窮，一文亦不能給我。我迫不得已而出言不遜，冒犯了他老人家，我是一個粗人，因為窮不可耐，當時亦顧不到失敬了，但是他老人家依然是笑嘻嘻的對我說，緩些時日要爲我設法。當時我認爲他是在敷衍我，忿忿然走出客廳，離開他的住所。不料我剛剛離開寓所的大門，總理的侍衛黃惠龍、馬湘兩個傢伙，追趕上來撲我，說我不該侮辱總理，要教訓我一頓。我是懂拳術的，但他們二人亦是行家，一人敵二人終有點抵擋不住，正當我要敗下陣來挨一頓飽打的時候，忽然總理在樓上用廣東話大聲叫道：『黃惠龍同志、馬湘同志，自己的同志打不得，打不得！快停手！自己的同志打不得呀！』在我十分危難中，黃、馬二人停了手，弄得我垂頭喪氣，羞慚得無地自容而回到家裏，現在想起來真是不應該！真是不應該。」

王某說到這裏更激動的說：

「不料過了不久，他老人家手中寬裕一點，仍叫人送了五百塊大洋給我，我對不起總理的地方他老人家並沒有介意。我這一生丟人的事雖然也有過，但是再沒有這件事使我心裏更感到難受的了！」

他說到這裏，竟掩面嚎啕大哭如喪考妣，王某是一個粗人，是一個不純良的粗人，中山先生的寬厚仁慈畢

竟感動了他，他竟如此其悲痛，好似嬰兒之失去慈母一樣。

七、博覽羣書 好學不倦

除了仁慈寬厚之外，總理的另一偉大精神，在我個人親身的體認，則是他博覽羣書，好學不倦的精神。關於他在學生時代即以最優的成績畢業於香港醫學院的經過，記述的人已經很多，我不願在此多所陳述。我要述說的是他離開了學校以後，開始他的革命事業時在奔波流離、困苦萬狀之中，追求知識學問那種可敬可佩的讀書精神。

遠在一八九四年「上李鴻章書」中，總理就會經針對時弊，有過下面一段沉痛的話：

「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上面這段話，說明了知的重要，同時更說明了不知的危險，由於不知之人太多，國家每一興革，不但不知之人不能讓已知的人放手做事，反而要格於成例，多方阻撓，使其歸於無成。從前是如此，現在又何能例外！近代民主政治最重要一個基礎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在使知的人盡量增多，不知的人大量減少，如此國家的興革便易於推行了。知的來源一是靠學問，一是要靠經驗，而讀書則是集聚知識學問經驗最大的途徑，所以不讀書的人便談不上深透的知，更談不上能鼓動風潮，轉移時勢，建設國家的革命大業，我們要了解 總理的革命事業的成就，從他追求知識，勤勉讀書的生活中可以窺見一斑。

說到 總理的讀書生活，在我所知的範圍內有的是從較我年長的同志處聽來的，有的是我親身經歷得知的。在我親身經歷所知的一部份，往往都是我少年天真幼稚可笑的記錄，率直的把他說出來，也許對於青年人是有所幫助，我們對於 總理的爲人也更能有所了解。

我記得在民國十二年的冬天，當我正要从加拿大都朗杜城動身回國的時候，我的朋友劉奇峯先生自美國紐約寄了兩本新書給我，作爲他送行的禮物，一本是羅吉爾和威勞貝合著的「戰後歐洲新憲法」Roger Willoughby "The New Constitution of Europe"，一本是羅吉爾和麥克本合著的「近代政治問題」Roger Mcham "The Problems of Modern Government"，在劉先生的來信說這是他對我國送行的禮物；而這一禮物是非常的名貴的；因爲這兩本書是他寄信的那一天才在書店出現的新書，也許他就是第一個購買這兩本書的人。那時還沒有從加拿大到中國的飛機開行，最快的交通工具是輪船，大約要二十多天才到達香港和廣州。在太平洋上二十多天的航程中，我把這兩本書大體讀了一遍，我讀後覺得非常愉快，我覺得愉快的理由倒不是完全由於書的內容如何的好，而是因爲這兩本書是我最早得讀新書，爲他人所不易得到的機會，等待到了國內以後，我便可向別人誇耀自己的新知了！我少年時代這等狹隘的心胸，實在由於根本不知道知識學問是拿來做什麼的。現在想起來，真覺非常幼稚可笑！在過去和現在的知識份子當中，像我這種情形的人，可以說仍是還有不少。

到了廣州以後，一天我向 總理請教一件事，那時他住在河南大本營樓上，大概是他方才用過午飯，正坐在放置在飯廳的一角一把沙發椅上沉思，他見我來了，便叫我端一把椅子坐在他的旁邊，他對我說道：「你方從外國回來，最近外國有什麼新書出版？」我馬上便把上述的兩本新書的名稱告訴他。總理又問我：「書中的內容如何？」我此時正如學生投考學校，遇着考試的題目，正和事先所準備的一點不差，心中的愉快，不言可知了！

於是我便很得意的把兩書的內容，盡我所知的一一陳述，對書中某些地方並特別加了些我自己的意見來批評，這樣好似顯示我是非常飽學的樣子！我滔滔不絕的說了大約有半個鐘頭，他一聲不響的聽着我說，一點也不加阻撓，一直到了我把話說完之後，他才由沙發椅上移動，走到坐旁的一間書櫥，取出了一本紅封面的書，帶着微笑，對我說道：「你所說近代政治問題一書，是不是就是這一本？」我接過來一看，正是我所說的那本羅吉爾和麥克本合著的「近代政治問題」，我此時心裏漸漸浮起了一種不安和驚奇的感覺，我心中這樣地在想，如何總理竟這樣快有了這本最新出版的書？等到我把書翻開來一看，見着書中用紅藍鉛筆劃了許多的橫線，有些地方打着問號，書的上方偶然發現不少的圈和叉等等的記號。這顯然是說明他不僅具有了此書，而且是已經很用心地讀過；因為這些記號，都是他在閱讀時，遇着重要的地方留下來的符號，我此時的心情非常不安靜；在先是驚奇，繼之是恐慌，最後面上漸漸似乎在發熱，覺得慚愧。驚奇的是以總理那樣日理萬機的人，何以有時間來讀這些新書？恐慌的是我方向他陳述書中的內容，究竟有無錯誤？慚愧的是我如果說錯了豈不使他見笑，說我是在班門弄斧？

當我正陷於萬分窘迫的情形中，總理很慈祥地帶着微笑對我說：「讀書要多讀新出版的名著，這樣才能淵博，才能吸收新知。閱讀專著也很要緊，這樣學問才有系統。你現在已經在做事了，做事時更要抽出時間來讀書，不然便追不上時代，一個人追不上時代便會變做一個落伍者。你還年輕，你好好用功。」在聽了他這番話以後，似乎沒有一點指責我的地方。或許還帶有一些勉勵的意思，於是我緊張的情緒，才漸漸獲得鬆弛！

因此，我自從有了這一次經驗和教訓之後，使我此後談論學問方面的事，似乎養成了多少慎重和虛心的德性。我時時遇着青年的朋友向我請益，我便把這一經驗告訴他們。

我考察研究 總理何以嗜讀新書，而又能很快的得到許多新書供他瀏覽的原因，一直到他逝世以後才完全明白。第一、因為他是舉世皆知的中國革命領袖，有若干新書出版，可能是由著者儘先寄贈請他批評。第二、據我所知在中山先生個人方面的支出，每月固定有一筆開支！那便是他的購買外國書報的費用。在廣州大本營時代，此項開支每月約毫洋三百元，值美金約在一百五十元左右。他生活非常儉樸，這筆支出可能是他個人方面最大一筆了。第三、他是幾個外國書店的經常顧客，可能有若干新書出版便由書店首先寄給他，也許他與書店事先有一約定也未可知。凡此種種，都是他在研究新知上所具有的特別便利，而為他人所不易有的。當他在世時，他在國內常住的上海廣州一些地方尚無完善的圖書館，無從供他的利用，如果他沒有上述一些特別的便利，有關外文書報的利用，就不很容易。總理能够充分利用圖書館供他閱讀，要算是在丙申（一八九六）年，他在倫敦被囚蒙難脫險之後，他整整留在歐洲約有兩年時間的時候了。在這兩年當中，他大部時間是消耗在大英圖書館裏，他用功之勤，可以從英國倫敦警察局派來暗中偵察他行動的密探，關於他的報告見之。報告中說：他自早至晚都在圖書館閱讀，到了用膳的時間也不離去。他的糧食是幾片麵包，在館內取杯冷水就此充飢。

凡是知道 總理的人，都曉得讀書幾乎是他閒空時間一種嗜好，是他一種讀書癖，勿論在平時，或在緊張的時期都是如此，他一生最為同志稱道的有兩件事：一是每遭革命失敗的時候，別人或是沮喪嘆氣，或是乞靈於詩詞小說，以作消遣暫時安頓心靈；而他往往在這時期，取專門巨著而細讀之，從容一如平時，一點無沮喪悲觀的形象。胡漢民先生每每談及此事，認為是他平生所見的第一人。胡先生為人極富自信，據他自己所說，在他遭遇革命挫敗，或遇拂意事的時候，也只能以詩詞小說或奕棋自遣，遠不如 總理從容鎮定閱讀專門巨著而引以為樂。二是 總理每遇挫敗或拂意的事而為他人所不能忍受者，他皆能處之泰然。據胡先生的意見，他認為 總理所

以能如此的原因，是由於他認革命爲當然不斷的進化，在危疑震撼的當中，他能綜其全體以爲衡量，故對於革命認爲只有成功而無所謂失敗。他對革命的此種樂觀態度是由於他對革命之深切認識而來，而此一深切認識則是由於學問與讀書而來；因爲讀書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一種修養與造詣，而爲他人所不及的。

戴季陶先生常說 總理博覽羣書而有其特別獨到的觀點。他說：「我們讀書是彎腰去接近書，中山先生則是挺着胸膛在讀書，合於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於他需要的便等閒視之。我們是役於書，而他則是役使着書。」戴先生這一意見正與 總理答邵元冲先生所問的話相吻合。一次邵先生問總理：「先生平日所治甚博，於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工程、自然科學的專著，都嗜讀不倦，畢竟先生以何者爲專攻？」總理答道：「我無所謂專攻，我所攻者乃革命之學問，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我革命之知識及能力者，我皆用以爲研究的資料，以組成我的革命學。」

總理在他所著孫文學說一書中也曾說到讀書的方法，他說：「能用古人，而不爲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爲古人所奴，則載籍皆似爲我調查，而古人爲我書記也。」他這種讀書的氣魄與方法實在值得我們效法。不嗜讀書是一件不好的事，死讀書而沒有魄力與方法，縱然是博覽羣書耗費一生的精力，也將一無所得，最多也不過成爲一個我們所謂的書獃子罷了。

隨侍 總理較久的人都知道他雖然是對中西典籍、報章雜誌，無不喜歡閱讀，但從未有人見過他閱讀小說雜誌及其他無關學術的書。當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他因處永豐兵艦督師討賊五十餘日，雖備極困苦，而志氣堅定愈久而愈奮，其時天氣炎熱，艦中迫窄，他每日除手草函電，促各路討賊軍進攻叛逆外，終日仍危坐讀書一如平時。他之如此喜愛讀書的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志在增益他的革命知識與能力來完成他救國的抱負。中國讀

書人有句自勉的話：「大丈夫應當不負所學與所志」。要做到不負「所志」，自必先把「所學」的基礎打好。

總理的一生，可以說對不負所學所志兩者都已做到了。

另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總理哲嗣孫哲生先生生前，曾把他多年來所珍藏的一批有關總理珍貴文件，交由國史館來典藏。這些史料中，有總理民國八年寫給哲生先生的兩封信，談論著書譯書買書讀書的情形，令人十分感動。總理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一封信的原文是：

「父近日熱病初愈，經已起手著書，或於數月後著成一書也。兒有暇當從事於譯書、讀書，或從事於實地考察，種種學問，切勿空過時光，蓋出學堂之後，乃為求學之始也。林子超先生回粵，父交他帶回新購之書十本，若汝有此種書，便可將重複者寄回上海，以便交回書店也。父近日往日本洋書店定購數百種新書，現尚未付到，倘付到時當再寄一書目付汝。汝要看何種，可由郵局轉換寄來。汝日前與我之宗教破產一書，殊為可觀。父自讀 Dr. White's War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之後此書算為超絕也，其學問考據，比 White 氏有過之無不及，父看過後已交孫夫人看，彼看完再傳之他人也。近日父得閱一書為 Cell Intelligence the Cause of Evolution 其思想為極新，駕乎近時學者之上，待孫夫人看完，我當寄來汝，汝可譯之，亦可開中國學者之眼界也。今日媳婦與二孫來，我順與他等一起到宋太夫人處，蓋我到上海以來尚未去過，後回來晚飯，飯後孫夫人與媳婦同去買物並送他落船，我留家剛有暇，故順筆書此，餘事托廖仲愷先生回粵面言，汝接此當往省一見仲愷先生可也，此示。父字七月二十六日書。」

在八月十二日，總理寫給哲生先生的信中說：

「明日葉夏聲先生回粵，父托他帶回西書八本，皆父已過目，或從前重買者，中有一本 Government

by All People 父甚欲你譯之，有暇可速從事，因中國極需此種之知識也。」

從信中所言，我們獲知讀書事，在總理與哲生先生父子之間是一件何等重大的事。總理發現好書時，必定要命哲生先生讀，而哲生先生亦常寄書給父親。父子之間從讀書中，得到共鳴的快樂。讀書的範圍雖然很廣，但目標只在尋求救國救民的大道。

總理寄書給哲生先生讀，遠在民元前後即已開始，據哲生先生在其八十述略中說：「我在求學的時候，功課原已十分緊迫，加上辦報和演講等工作，一天到晚，忙個不停，但先父不時從各地寄來一大包一大包的書籍要我閱讀。如果他在南洋一帶旅行，寄來的幾乎全是我國的線裝書，到了歐美，便寄英文的各種名著來。像『通鑑紀事本末』，『讀通鑑論』，『進步與貧窮』，『互助論』，『達爾文遊記』，『物種由來』，『麵包的征服』及『莎士比亞全集』等，都是我在那一時期曾經讀過的書。記得我所收到的書中，也有不少關於各種思想和主義的著作，但是沒有一本是馬克斯和恩格斯這一類人所寫的。這可證明先父對於他們의 思想和主張並不贊成，所以也不讓我去研究」。

凡是研究總理思想的人，鑽研愈深，愈感覺到總理思想之博大精深，其原因就由於總理所讀過的書太多，而我們的學殖低淺，涉獵未廣，放難於窺知總理思想的底蘊。做學問要追根究底，如果我們能够把總理所讀過的書一一了解，我相信對於研究總理思想，必是一項重要的助力。多年以來我曾經對此用過一番功夫，但所知仍極有限，不過從上舉兩封家書中，我們對總理好學不倦的精神真是傾仰無已了。

八、嚴守信誓 篤重情感

總理守信誓、重情義的精神，也是爲同志和友人們一致承認和敬慕的。這種精神，從幼年時代便已表現出來。譬如說，他在世之日對自己的生日一向不作公開的慶賀，就是爲了對父親守信誓。我們曉得總理幼時，曾取名爲「帝象」，寓「帝王之象」之意，是個有嚴重意義的名字。據仲愷先生說：孫先生的父親對於帝象這一名字，後來心理上起了一個極大的矛盾和恐怖，那就是說，既然家庭裏誕生了這樣「大富大貴」的孩子，如果是祖宗積德不厚，此一麟兒未能長成便遭夭折，將如何辦呢？再則，家庭有這樣具有帝王之象的人誕生了，在當時專制的社會，如果被官府知道了，不僅要危害帝象，而且將連累家庭同受禍災，又如何辦呢？達成公在這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不安心情之下，終於在國父六、七歲時想出一個不脫舊社會俗套的辦法，以作補救。爲了補救恐怕祖先福澤不厚，不能保佑他鍾愛的兒子成長起來，於是他把孫先生帶到翠亨村的一座廟宇，把他寄拜給廟內所供奉的北帝菩薩爲子，靠菩薩的保佑使他長成。爲了恐怕官府知道，據說他命孫先生於拜神爲子之後，曾很嚴肅的對孫先生說：「我要你在神的面前發誓，自此以後不得把你的生年月日告訴外人。你能做得到，便答應我如此做。做不到，也要對我明說。」「我一定做得到」，孫先生拍着胸膛毫不猶豫的答覆了他的父親。

假定我們以廖仲愷先生這一段關於孫先生誕生的故事爲參考，我想便不難知道他爲什麼一生不曾公開舉行過祝壽的道理。世人之所以很少知道他的壽辰的日期，便是由於他爲了要實踐他兒時對父親所作的諾言，不以生年月日隨便告人的緣故。

重信誓的精神是總理建國方略中心理建設的一個最重要環節。因此他在革命組黨的時期，規定入黨宣誓是取得革命黨員資格的重要條件。他在民國元年就任臨時大總統位時，率先舉行宣誓，他當時更主張文武官吏，都要一律宣誓，以表示盡忠職守，歸順民國，永久不渝。可惜當時大家都不重視此一意義，認爲不急之務而漠然視

之，未克普遍舉行。其後他讓臨時大總統職位於袁世凱，他對袁氏提出的一項條件便是要袁氏必須於就職時宣誓服膺共和，永絕帝制。當時大家以爲這種空洞的宣誓，何能約束野心奸詐的袁世凱，而未加重視，但因孫先生十分堅持，且以自己就任的時候曾經宣誓爲例，終爲袁世凱所接受。袁氏是一奸雄，是一老官僚，他認爲此種細節於他取得實際政權並無多大影響，便也就欣然接受了。孫先生一定要袁世凱宣誓服膺民國，永絕帝制的理由是：「袁世凱向爲君主的臣僕，而不主張共和者也，而民黨昧然讓總統於袁，已自甘於犧牲共和矣，既甘放棄於前，而又爭之於後，非愚而多事乎？惟有此信誓則不然矣。」果然後來袁世凱背叛共和，帝制自爲，我們便以背誓的理由討伐他，他的部下也有理由不服從他，帝制終歸於失敗，這未始不是其中原因之一。

總理爲什麼如此重視宣誓呢？據他的自述，認爲常人有言，中國四萬萬人，實等於一盤散沙，今欲聚此四萬萬散沙，而成爲一機體組織之法治國家，則必須從宣誓以發其正心誠意之端，而後修、齊、治、平之望可幾。換句話說，宣誓是要每個人從他的內心自發的拿出他人格和榮譽對於他所願接受的事情提出擔保。這是人類一個「心靈的王國的建立」，這個王國建立不起來，一切都是虛偽的，無信念的和不可範圍的，那末這樣一個社會便會趨於崩潰橫決了。

總理對於西洋社會的看法，重信誓的精神是其一端，而我們中國，特別是上層社會的人，便缺乏這一種精神，所以他主張宣誓，作爲建設國家一個正心誠意的發端。不能做到正心誠意，便不能做到修、齊、治、平。他認爲革命的組織，是「先天的國家」，如果有志於革命的人，不能共立信誓，以實現他們的理想，必然是渙散而團結不固，團結不固，必定是歸於失敗的。所以建立重信誓的精神是革命黨人第一個條件，也即是他所謂：「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爲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因此遠在興中會成立的時候，就訂定了會員宣誓的誓

詞，民國紀元前七年同盟會成立，民國三年國民黨改組爲中華革命黨，民國八年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每次黨員入黨以及黨的各級重要人員就職，都必須鄭重舉行宣誓，其中尤以民國三年國民黨改組爲中華革命黨之際，孫先生爲了要加強黨員對信誓的嚴格遵守，並規定宣誓人必須在誓約書上加打手印，當時確有不少先進同志對這一規定不以爲然，因而表示反對，甚至爲此而未加入中華革命黨。革命前輩張溥泉先生在回憶錄中曾記述道：「民國三年 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余打手指拇，總理以手強余打手指，余婉拒之。」從這段話，足見總理對信誓看得如何的重要了。從現在黨史史料中，我們尚可見到當日 總理親書的誓約和先總統 蔣先生親書的誓約，在這一誓約的簽名下所打指拇仍隱然可見，這種獻身革命的至誠表現，實在令人仰慕！

在 總理的一生中，有一件事爲一般人所指責與不了解的，那便是他民國元年就任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在解職大總統之前不久，他率領文武百官恭祭南京的明太祖陵；典禮十分的隆重，他自稱爲「國民公僕」，並有一極美麗的祭文在陵前宣讀。這一舉動曾引起當時若干人對他的批評和指責，而孫先生均一言不答，任人批評。這些人所持的理由是：在這一時期，滿清政府已將宣佈退位，贊成共和，舉國的人都熱望着和平，過去革命排滿的熱情已轉變而爲五族共和的高調了。恭祭明太祖陵這一舉措，無疑的要被時人認爲是一個足以引起漢、滿、蒙、回、藏五族團結的障礙，是我們所想像得到的。但是孫先生爲什麼要如此呢？那便是爲了實踐他曾經加入洪門致公堂，對反清復明的誓言有所交代。

要了解上述這故事的原委，我們必須知道會黨在革命的初期與孫先生倡導的革命運動的關係。在國內方面，從乙未（一八九五）第一次廣州起義的失敗，到庚子（一九〇〇）年三洲田之役，其中主幹人物鄭士良便是會黨一位傑出的英雄，鄭的力量則全賴廣東的會黨。其他如黃克強先生在兩湖一帶所發動的革命運動，也無不以會黨

爲中心。因爲從興中會到同盟會的成立，國內可以爲革命之助的力量，會黨實居首要。那時的會黨是以反清復明爲宗旨，與孫先生革命排滿的主張不謀而合，而會黨的成分又以下層階級爲多，歷史悠久，組織普遍，故其發爲行動，也較容易。而當時的士大夫階級，一因滿清入主中國二百多年，民族大義已漸漸消失，二因知識分子生性渙散，漫無組織，以言論文章作革命宣傳是其所長，一言行動，則又不如會黨之便於散集了。

總理是一九〇三年於檀香山才加入當地的會黨組織，名叫致公堂，致公堂是舊民族主義在海外的反清團體。爭取海外華僑參加革命是當日最必要的一着，要爭取華僑，先爭取海外的洪門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孫先生加入致公堂的唯一原因。海內外反清復明的會黨組織相沿都是與官府作對，因此他的一切活動都十分秘密而嚴格。凡是加入的人必須宣誓做到兩件事：一是服從他的反清復明的宗旨，二是嚴守會內的秘密。先生要加入致公堂，當然不能例外。他把一切手續都做到後，便被封爲洪棍，即大哥之意。孫先生曾經作過一項努力，想把致公堂改組爲近代化的一個革命團體，但這一努力未能完全做到，他所做到的僅是獲得海外洪門對於革命運動有力的支撐，擴大了他領導的革命運動的發展。後來他爲了適應中國革命進步的需要，在一九〇五年便把以會黨分子爲骨幹的興中會，改組爲青年知識分子和各階層的進步分子爲中心的同盟會，革命的形勢便日益擴大起來，在七年之後便有辛亥之役，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專制政體，建立了中華民國。

我們於明白了上面這一段經過之後，便可知道孫先生於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爲什麼不計他人的攻擊，而要率領文武百官恭祭明太祖陵的原因所在。他唯一的目的在表示滿清既將宣佈退位，民國即可成立，洪門反清復明的宗旨便已達到，他於加入洪門時的誓言便已實踐。而他爲了適應革命新的進步的需要而要作的努力正多，恭祭明太祖陵後他的心靈的責任便已解除了。這是他辛亥時恭祭明太祖陵的動機，也是他對曾作過的誓言的一種交代。

這種實踐誓言的精神又是何等的偉大呀！

至於 總理篤重與同志及友人間情義關係的例證，實在太多了。他與黃克強先生之間的關係和情義，曾爲日本籍的革命友人們一致傳頌。當黃克強百年誕辰的時候，我曾發表過一篇「國父與黃克強先生之關係與情義」的專文，來追述這兩位革命偉人間不平凡的情感。此外 總理與張人傑、陳其美、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先生之間的情義，亦爲肝膽相照，令人欽羨。

當然，最令我們感到興奮榮耀，也最值得我們景仰效法的，還是 總理和 總裁間同志而兼師友的深厚關係。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對於 總理之器重 總裁及 總裁之師事 總理，或許比我瞭解的還多，但我仍然把我所知道的 總理和 總裁間的關係，報告幾件重要的事，供各位參考。因爲我認爲 總理和 總裁的偉大人格，已爲我們樹立了最崇高的風範和最完美的榜樣。

總裁第一次晉見 總理是在民國前二年，那時他纔是廿四歲的青年，論學業則僅僅是日本振武學校一個畢業生，論事功則當時負時望的大有人在，而 總理在第一次接見他時，便許他爲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總理是在衆人中選識了 蔣先生，而 蔣先生此後的成就亦真不負 總理的期許，這在治歷史的人看來，不能不說是一件偉大而難能的奇蹟！

當民國十一年，總理孫先生在桂林督師，感覺陳炯明勾結北方軍閥態度不穩時，便由桂林回師廣東，先謀後方之穩定，再行北伐。孫先生到了梧州電陳炯明來見，陳竟不敢來，乃下令免陳炯明本兼各職，陳遂退兵惠州佈防石龍一帶。當 孫先生率領大軍到三水，總裁即建議大軍進駐石圍塘，並主張力攻石龍惠州，消滅陳部，以除北伐後顧之憂。孫先生以寬大爲懷，盼陳悔悟，不欲遽加摧毀，於是 總裁於到達廣州後，便有去志，

孫先生知道了他要走的消息後，特親致挽留。對總裁說：「此時你若走，則我與汝爲機能全失，人無靈魂，軀殼有何用處？」總裁深受感動，雖然暫時答應不走，然因主張未被採納，而又加以當時環境也極複雜，後仍回到浙江。蔣先生當時堅決主張先肅清陳炯明之理由，可於其是年六月一日致許崇智先生的信中窺其用意，信中說：「吾果能先發制人，則無論其集中東江，或盤據省城，不難一網打盡，否則猶豫不決，遷延隱忍，必有束手無策，噬臍莫及，不可挽救之一日，惟願吾言之不中耳。」後來果然由於遷延隱忍，不出他之所料，陳炯明竟於六月十六日稱兵叛變，幾幾乎危及總理的生命安全。及至總理困守珠江兵艦上，總裁聞訊立即萬里赴難隨侍孫先生左右，在危難萬狀中奮鬥達數十日，一直到了北伐軍回師討陳全盤失敗，乃又追隨孫先生到了上海，所以孫先生爲蔣先生所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書作的序文中有：「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生死……」的話。

總理於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由上海啓程南行於同月廿一日抵達廣州組設大元帥府，並任命蔣先生爲大本營參謀長，蔣先生於四月十九日抵廣州，在此時期陳猷決策，草檄批牘，籌戰守，饋餉糈，出隨車駕，入掌樞機，日不暇給，革命軍事大責重任叢集於一身。

我在此要舉出一件小事，以說明總理是如何的在軍事上倚重蔣先生和如何的信賴他。

民國十二年六月三十日，陳炯明進犯廣州，蔣先生隨總理赴石灘督師。在這以前的兩日，（五月廿八日）陳炯明見劉震寰軍圍攻惠州急，乃令別部抄出後方，襲陷博羅，進窺石龍，廣州震動，總理親在石灘督戰，時潰兵麇集，傳聞石龍已失守，蔣先生不之信，自領衛隊鄧團二百餘人前行，各部始不敢再退。俄頃得報石龍無恙。總理問其故何在？蔣先生答曰：「料逆部佔領一城，須留滯時日，我軍昨日失博羅，離石龍九十餘里，

彼必不能迅速若此，是以知之。」

這是一件小事，其他決疑定策之大事，總理之信賴於蔣先生者類此者甚多，這並不是偶然，而是他信譽素孚，洞燭機先，總理對他產生了堅強信賴的緣故。

總理對蔣先生之倚重已非一日，民國九年他寫給蔣先生的信中曾說：「……自執信忽然殂折，使我如折左右手，計吾黨中知軍事而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則又過之。」

民國十年，蔣太夫人逝世後，總理有一篇恭祭蔣太夫人的祭文，在這篇祭文中有下面的句子：「文與邵君介石，遊十餘年，共歷險艱，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驂之靳，朝夕未嘗離失。」譚祖安先生在當年總理致蔣先生手扎廿三通上曾附跋了下面幾句話，他說：「……至其期望介石之深與待之之厚，諄諄如家人父子，尤令人三復感激……」觀此就足見總理對蔣先生倚畀之殷切了。

說到蔣先生的肝膽照人勇敢誠篤，在革命的史績中記載得很多，民國四年春，陳英士先生由日本回國，蔣先生送英士先生到橫濱輪次，臨別時黯然對英士先生說：「此去萬一不幸而為袁氏所害，余當為兄化身，以成未竟之志。」到了民國五年五月英士先生不幸被袁世凱以七十萬巨金購買刺客李海秋，暗殺於上海法租界日本同志山田純山郎的家中後，不僅同志親友驚惶不敢露面，就是山田本人也恐怕大禍及身，咆哮失態，前後如出兩人，惟獨蔣先生挺身而出，把英士先生的屍體運到自己家中，親為治喪善後。他在祭英士先生的祭文中說：「丁未至今十載，其間所共者何如事？非安危同仗之國事乎？所約者何辭？非生死與共之誓辭乎？而乃一死一生，國事如故，誓詞未踐。死者成仁取義，固無愧於一生，而生者守信堅約，豈忍惜於一死？嗚乎大難方殷，元兇未戮，繼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死者之業，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猶生。死者之志未終，而生者終之，死者之業

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終不已，不成而不死亦不已，以覆去春握別扶桑第二化身之懺語，以守我之信，堅我之約而已……」這種在公義與私誼上所表現的卓絕行爲，正是 蔣先生至性至情的流露，亦正是他建立偉大革命事功的一個根源。

九、崇尚學術 尊重學人

任何時期的革命，都是一種思想的革命。思想必須以學術做基礎，沒有學術做基礎的革命是難以有所成就。所以任何一種革命運動，都是時代的一種文化運動。中國革命在 總理孫中山先生領導時期，是一段最艱苦的時期。要把中國從幾千年歷史的專制王朝中解救出來，建立成爲近代的、民主的三民主義的國家，並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大多數人的知識水準太低，舊觀念的根深蒂固，幾千年來的專制政體習染已深，要想將它推翻，重新來建立，不是專靠革命的行動所能爲力，而是要靠一種「思想的根源」，而這思想的根源，必須完全建築在學術之上。

自民國元年元月元日，總理就臨時大總統職於南京，迄是年四月一日卸臨時大總統職，爲時僅三個月。就此三個月中已知文獻而論，其氣度之恢宏，對人才之迎致，對異己者之容忍，對民意之尊重及民主憲政制度之規劃諸端，其立意之深遠，規模之宏大，實爲舉世所罕見。茲就民國開國初期的宏規中，關於尊重學人，重視學術的事例略舉數端。

一是民國元年元月二十六日，孫大總統電四川資州軍政分府，飭優遇並護送隨端方入川之國學家劉光漢來京，以崇碩學。同日，教育部亦秉承 孫大總統德意，電四川資州軍政分府，文曰：「報載劉光漢在貴處被拘，

劉君雖隨端方入蜀，非其本意，大總統已電貴府釋放，由貴部護送來部，以崇碩學。」劉光漢實爲當時革命黨之傑出學人，其妻何班亦曾受新式教育，具有新思想，亡命日本時曾以「何震」爲名，常爲「民報」撰文。其時劉忽與章太炎（炳麟）有所齟齬，宵小之輩遂乘之，挾何震以劫持光漢，光漢竟入宵小之圈套，被誘入滿清大臣端方幕。端方於民前一年以查辦川事大臣入川，劉隨之。端方於資州被殺，傳說劉光漢被拘，孫大總統爲尊惜其學問，乃急電資州軍政分府，囑予優遇並護來南京。

劉光漢原名師培，字申叔，號左蘊，江蘇儀徵人。滿清末年，以精通經學，有名於世。民國前九年，於北京會試歸途，滯上海，與革命愛國志士遊，遂贊成革命，改名爲「光漢」，並著「攘書」，昌言排滿復漢。其後，創「警鐘日報」，並爲「國粹學報」、「民報」等撰述，諷切時政，嚴辨夷夏，頗爲學術界重視，又創辦白話報以啓迪民智。因是爲清廷所忌，民前五年，亡命日本。其時梁啟超之「新民叢報」停刊。而楊度創「中國新報」，亦爲反革命之宣傳，以祖述嚴復所譯之甄克思「社會通詮」所標榜之軍國主義，作反對民族主義之理論。楊度自稱爲「金鐵主義」，合鐵血與金錢企起垂亡之中國，而謂滿洲民族數千年前亦與漢族同源，不必妄生分別，中國人民惟宜擁戴之，求得君主立憲，即可勵精圖治云云。劉光漢乃以「韋家」的筆名，著「滿洲非中國之臣民」的長文駁斥之，詳考漢族之起源，如數家珍；劉素長掌故考據之學，文雅且博，楊度不能反駁。以是，楊之嚮壁虛造，乃成徒勞。自光漢文出，遂無復言滿漢同源以惑衆者。劉氏筆伐之功，在民前的確對革命大有貢獻。

劉氏後從端方入川，乃與民軍爲敵，實一變節之人。而孫大總統知非出其本意，乃受宵小誘陷，爲尊惜其學術上貢獻，急電資州軍政分府予以優遇並護送來京。

二是民國元年二月六日，孫大總統聘章太炎先生爲樞密顧問。孫大總統致章氏的原函如次：

「太炎先生執事：自金輪失馭，諸夏沈淪，炎黃子姓，歸於僇隸。天佑厥衷，人神奮發，禹域所封，指顧奠安。實賴二三先達啓牖之功，文亦得密勿以落於諸君子之後。惟日孜孜，猶多隕越，光復閔業，懼有蹉失，唯冀耆碩之士，爲之匡襄，砥礪民德，綱維庶政。豈惟文一人有此槩臬。冠裳所及，實共賴之。執事目空五蘊，心殫九流，擷百家之精微，爲並世之儀表，敢奉國民景仰之誠，屈爲樞密顧問，庶幾頑懦聞風，英彥景附，昭大業於無窮，垂型範於九日，佇盼高風，無任嚮往，急惠軒車，以慰飢渴。」

讀了孫大總統這一聘章氏爲樞密顧問的原函，就可知道他對一代碩學的章氏是由衷的仰望和敬重。這種尊重學人的襟度，形諸文字者有如此其謙誠。

章太炎先生在革命思想戰爭中，可說是一個急先鋒。他早年曾一度同情於康有爲、梁啓超的維新運動。當康梁所領導的戊戌維新失敗，康梁逃亡海外，太炎先生曾一度來臺灣；次年己亥（一八九九年），應梁啓超之約抵日本橫濱，其時總理亦在其地。故太炎先生最早與總理接觸，地點乃在梁啓超的橫濱寓所。是年七月，太炎先生抵上海，認識與康梁有關之唐才常。其時唐正在滬組織正氣會，旋改爲自立會。次年庚子（一九〇〇），義和團事變發生，唐獲康梁之支持，在滬召集「國會」，組織自立軍，其宗旨介於保皇與革命之間。太炎先生反對唐之首鼠兩端，更堅決反對「勤王」。他在憤激之下，剪斷辮髮以示決絕。迄唐才常在武漢失敗被清兵所殺，太炎先生乃避居蘇州，執教於東吳大學，放言高論，爲清吏所忌，不得不避往日本。在日受秦力山先生之影響，益傾向於總理所領導的革命運動。秦力山先生原爲唐才常自立軍之主幹，大通獨立失敗後逃往日本，發現康有爲在海外募集大批華僑捐款，並未如期接濟，自立軍以是招失敗，對康梁頓起反感。在太炎先生到日本之前，已投身於總理所領導的革命運動。

太炎先生與 總理在日本暢敘，是一九〇二年的事。太炎先生自述云：「往謁逸仙，與晤大悅。余亦素悉逸仙事，偕力山就之。逸仙導余入中和堂，奏軍樂，延義從百餘人會飲，酬酢極歡，自是始定交。」三人定交後，所論之事，見於記載者，一是「論均田之法」，一是「論定都」（即相宅論），二文皆收入太炎先生一九〇二年所著的「嘯書」內。是爲其早期革命言論之始，其後太炎先生返滬與蔡元培等成立愛國學社。其時鄒容亦甫自日本歸，以上海「蘇報」爲革命言論機關，鄒容之「革命軍」及太炎先生之「讀革命軍」等文相繼發表，鼓舞內地革命風潮，其力甚巨。太炎先生在「蘇報」發表之「駁康有爲政見書」中有「載湉小醜，不辨菽麥」之句，痛罵清帝光緒，因而引起著名的「蘇報案」，開朝廷與人民涉訟之端。須知專制時代，皇帝爲神聖不可侵犯，豈容痛罵？清廷向上海租界要求引渡未果，租界判太炎先生三年徒刑，鄒容二年徒刑。鄒容不幸刑期未滿即瘐死獄中。自此皇帝之尊嚴頓失，而革命之怒濤益進於不可遏止之勢。此一朝廷與人民涉訟事件，由今視之，或並不覺其重要，而在反清革命運動中，却造成人民對專制王朝觀念上的巨大轉變，其影響於人心之大，是無法估量的。

一九〇六年，太炎先生刑滿出獄，東京中國同盟會迎赴日本主持「民報」筆政。後來爲了「民報」經費問題，太炎先生對 總理有所誤會，大發書生脾氣，使 總理一時陷於困擾。今在「國父全集」中可讀到 總理致吳稚暉先生信函多件，猶不難窺知當時太炎先生之失態，已非常人所能見諒。然而 總理對太炎先生却能毫無芥蒂，於民元開國後，挽其出任地位極爲尊崇的樞密顧問。 總理之尊重學人，重視學術的胸懷，由此一事例，更見其淵深。

關於 總理聘請太炎先生爲樞密顧問一事，太炎先生自述云：「孫公延余至江寧欲任樞密顧問，不能却。」他做了樞密顧問以後，對國事有所獻替，必據理力爭， 總理亦非常尊重其意見。例如：太炎講到 總理以漢治

萍公司許日本松方正義合資，與盛宣懷同署名事，太炎先生說：「余遽上書請速廢約，孫公以軍餉爲辭，往復數四，卒得請而廢約。」

總理對太炎先生的尊崇，純是出於至誠，儘管此種過分的遷就，有損於當時政治現實的需要，而對革命發生不良的影響，但對於尊重學術，善待學人的觀點而言，仍不失爲闊達大度的表現。我提出這一史料的用意，不是有所責難於太炎先生，而是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在開國時期的恢宏氣度。

三是民國元年三月，胡漢民、黃興、王寵惠、宋教仁、馬君武等先生，有一件「咨參議院請議決設立國史院」的呈文，呈文略云：

「溯自有文字，遂有紀載，古稱史官，肇於沮蒼，歷代相沿，是職咸備，蓋以紀一時之事，昭萬禩之鑑，甚盛典也。顧概觀中國前史，春秋史記而外，多一人一家之傳記，無一足稱社會史，可以傳當時而垂後世者。抑典午東渡而還，中原塗炭，自時厥後，國統淆雜，殊方入主，尤間代相聞，以云正史，不足十六，而所稱正史者，亦復狙於君主政體，其典章、制度、人物、文詞見於紀傳表志者，多未能發揮民族之精神。方諸麟經遷史，去之愈遠。若藉爲民國之借鑑，猶南轅北轍，鑿柄不能相容。誠以立國之政體不良，而紀載遂不衷於至當耳。今我中華聿新，民國前自甲午而後，明識遠見之士，恍於國之不可以見辱，而政體之不可以不改變也。於是奔走號呼，潛移默運，垂二十年。茲者民國確立，以前之艱難挫折，起蹶興躓，循環倚伏，不可紀極，若非詳加調查，筆之於書，着爲信史，何以彰前烈而詔方來，正史裁而堅國本？爲此連同衆意，合詞呈請大總統速設國史院，遴選董理，刻日將我民國成立始末，調查詳澈，撰輯中華民國建國史，頒示海內，以垂法戒而鞏邦基。如蒙俯允，卽請作爲議案，提交參議院議決，並祈從速特派專員，籌辦一切，民國

幸甚。」

對於上引呈文，孫大總統批示如左：

「呈悉：查中國歷代編纂國史之機關，均係獨立，不受他機關之干涉，所以示好惡之公，昭是非之正。使秉筆者，據事直書，無拘牢顧忌之嫌，法至善也。民國開創，爲神州空前之偉業，不有信史，何以焜耀宇內，昭示方來。該員等所請設立國史院之舉，本總統深表贊同，應候提交參議院議決。至請先行派員籌辦一節，俟遴選得人，卽行委任可也。此批。」

又元年二月十五日，卽清帝退位之第三日，亦卽總理向參議院辭臨時大總統之一日，曾電袁世凱云：

「袁慰庭先生鑑：聞奉天行宮所藏器物，由私人訂賣於外國，價值甚鉅。按此種器物，實爲民國公產，並非皇族私有，應行禁止私賣，特此奉告，請嚴飭禁阻。孫文刪。」

總理重歷史重文物的精神，由上述關於國史院之批示及電袁世凱禁賣古物二事可以見出。這一重歷史重文物的精神，自亦與他尊重學術與禮遇學人的精神一貫。而對認國史院之設爲急需一事尤其顯出其眼光之遠大，與乎抱負之不凡！

今天來追述總理尊重學術、禮遇學人，以及重歷史文物的史實，須瞭解在革命的初期，當時的舊社會充滿了牢不可破的「忠君」的臣僕觀念。自同盟會成立，喊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主張以後，革命最大的阻力，不單純是代表舊勢力的滿清政府，而是主張君主立憲與革命殊途的維新人物，如康有爲、梁啓超等等。他們是對傳統的思想學術具有強大影響的知識份子。他們只求在舊的政權上求改良，以實現其主張，由於其主張者爲溫和的改革，自易爲舊社會因循的習性相結合而反對激烈的革命。所以革命黨人如果不

能在學術思想方面擊敗這批依附舊社會舊政權的知識份子，便不能獲得革命的勝利。以康有爲、梁啓超爲代表的改良派，他們倡爲滿漢同源之說，以反對排滿革命，主張君主立憲以反對民主共和。更倡爲革命足以招致列強瓜分亡國之說，以使有志愛國之士，附和改良，而反對革命。當時革命所面臨的危機，已不單是行將崩潰的滿清朝廷，而是這些依附滿清，保護延續舊政權的改良思想。

前面所說的劉光漢、章太炎兩先生就是在革命艱苦的過程中，在學術思想上發揮強大力量，予改良思想以致命的打擊並鼓舞革命思想成長的傑出學人。當然，當時在革命黨人中，的確不乏更多舊學深邃、新知卓越的如椽巨筆。假如當時在學術思想的戰爭中，不能戰勝以康梁爲首的改良派，便不能有辛亥革命的成功，中華民國的創立。

革命是一種以思想和學術爲主力的文化運動，當時改良派所持以反對革命的主題，如「滿漢同源」的理論；如革命足以召瓜分，加速中國之滅亡；如詆民生主義足以助長乞丐流氓之猖獗，以破壞國家之秩序等思想言論。如果當時革命黨人未能從思想學術的觀點，加以駁斥、打擊和糾正，把革命大義普遍深植於全國的人心，而獲得勝利，則此後的革命，便不會有長足的發展。此一勝利乃是思想學術和革命理論的勝利，而不是單純的起義和行動的勝利。

最令人惋惜的是：自民國建立以後，由於辛亥革命的未能徹底，予軍閥官僚反革命份子以可乘之機，於是變亂相尋，迄無寧止。革命黨人乃不得不授以全力投入肆應時局的起義軍事行動中，而無暇在思想學術上作更大的努力，以致改良派人便轉而依附繼續滿清而起的舊勢力，一時填塞把持了學術文化的真空，阻撓了民國建設的進展。總理孫先生洞察及此，乃於民國七年至九年這一期間，在上海閉門著述，先後完成心理建設的「孫文學說」

，社會建設的「民權初步」，及物質建設的「實業計劃」等書。同時並創辦民智書局及建設雜誌等刊物，想從思想學術的途徑，以圖扭轉危局。但以是時政治軍事無憑藉，而人心渙散已久，收拾不易，見效不宏。直到民國十三年革命政府在廣州立定脚跟，才勉力在廣州創辦黃埔軍官學校，以建立真正的革命軍，以掃除革命的障礙；建立廣東大學，亦即後來之中山大學，以爲培養建國人材的基礎。前者收效甚宏，乃有民國十五年的北伐，十七年統一全國及二十六年的對日全面抗戰與勝利。後者廣東中山大學在建設人材的培養方面，惜因限於時間，未能與軍事的進展快速，及時相配合，而收效未宏。且以抗戰期間以全力從事於軍事的應付，以致學術、思想、文化又復陷於一種真空，而爲共產黨人的邪說所填塞，於是民國三十四年偉大的對日抗戰勝利之後，竟爲共產黨人所乘，而召致大陸淪陷，使七億以上的大陸同胞呻吟於共黨暴政之下，目前尙未能解救！

歷史是一面很好的鏡子，回憶開國前後對於學術文化的一再的疏忽與迷失，我們檢討過去的成敗得失，對其關鍵所在，當有所警惕而急起直追了。

十、平凡中的偉大

前面我已舉述了 總理孫先生生平中的一些顯著特徵，這些自然都是形成他崇高人格和偉大事業的因素。如果我們再從 總理平日立身行事的平凡事件中去觀察，就更能體察到他確實是一位寓偉大於平凡的人。

中國近代革命之能屢起屢仆，華僑的支持是一個重大的因素，所以 總理說：「華僑爲革命之母」。然而華僑何以能始終支持中國的革命呢？

一般研究華僑熱心支持革命的原因：一是認爲是得風氣之先；一是華僑身處異國，受盡壓迫，強烈的國家觀

念是自然會產生的，對於革命思想自然易於接受；一是華僑屬於廣東籍者不少，總理是廣東人，所以更容易得到華僑的支持。假定我們拿這三點作為華僑贊成支持革命的理由，那麼戊戌政變後逃到海外，主張保皇和改良來反對革命的康有為、梁啟超二人，在這三個理由上他們樣樣都比孫先生強，理應得到華僑的支持了，相反的他們却被多數華僑所擯棄，這又是甚麼原因呢！論到在當日舊勢力中的影響，康、梁的誘惑力量要比孫先生的號召力量大，在改良與革命的本質上，前者易而後者難，若說由於廣東籍的關係，那麼康、梁豈不也是廣東人嗎！何況在東南亞一帶的華僑屬於福建籍者遠較廣東籍者為多呢！如果我們要研究此中原因，當然不是在上列諸種理由，而是別有原因所在。要明白這一道理，那就必須要歸結到孫先生的人格和影響與康、梁大有不同上面去了。這一因素的重要，我可以舉幾件歷史的事實作一比較。

例如：康有為戊戌政變失敗之後逃亡到了海外，他偽稱光緒皇帝給他有衣帶詔來騙取華僑支持他的保皇運動，在初，信仰他的華僑頗不乏人，後來發現是他的一種偽造，於是他的聲譽便一落千丈了。而總理在極艱苦的情形之下，據我們所知，則從來不曾有過這樣偽造欺人的事實。又如庚子年唐才常在武漢的勤王運動，本來是要康有為在海外籌集的大批金錢為後盾，但是因為康有為的接濟成了騙局，此一運動便失敗了，唐才常和他的一些重要的同志都作了犧牲，自此康、梁在國內的類此運動便發動不起來，而總理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反而一天一天發展到了高潮。

以上所舉，也許會被一些人認為是細微末節，而不知這正是當日海外華僑對於革命與改良二者而為抉擇的一個重大關鍵。假使當日總理的革命主張不能為華僑所接受，康梁的保皇運動必定成為一救國的主流，中國革命運動便不能蓬勃的發展起來。凡是追隨過總理的人，對他都有一個共同的印象，就是他那種在任何失敗困難情

形之下，不灰心，不洩氣，從容樂觀的精神。如果說要有例外的話，那就只有他的自傳中所述，在革命初期的遭遇，他說：「由乙未到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我們讀了總理此一段自述，就知道康梁在戊戌（一八九八）以後，在海外的保皇運動是如何的對於革命的不利了。革命當日之能戰勝保皇運動，時代的推進固然是一個原因，而康有爲之欺騙虛偽，言行不一，不能如總理之光明正大，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以獲得華僑的支撐，是很顯明的一個事實。

我在民國八年赴美留學，曾親見過多數華僑公共場所都懸有一總理的照片，每見着華僑對着掛像不是脫帽，便是鞠躬致敬，我深覺得詫異！我心裏時時在想：爲什麼他們要對總理如此崇敬？這一種現象在總理逝世以後的國內情形本也平常，不過在那時一般人對於革命尙不了解，對於總理個人尙是毀譽參半的時候，就不免是特別了，因此使我時時都想要尋求出一個爲什麼他們要如此的答案。同時更聯想到華僑對於革命的最大支持是金錢，而多數華僑並不盡皆富有，何以他們捐助金錢支持中山先生革命又那樣慷慨？中國有句俗話：「要有錢人出錢，有如鈍刀割肉」，西洋人也有句俗語叫做：「要有錢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可見要人出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那時風氣未開，出錢來幫助革命是一件危險犯罪的事。我這一疑問一直至若干年以後方才獲得解答。

民國十一年由美國到加拿大都朗杜主持那裏的革命機關醒華日報社的筆政，報館的同志們到火車站來歡迎我，並爲預備該地的一間很考究的「太子旅館」供我住宿。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還在求學時代，受到了這樣的殊榮，感覺到非常親切愉快，也就受之不辭了。不料後來報館同志舉行聚餐，一位姓吳的老同志和我談到一些革

命的逸事時，他說 總理在辛亥革命以前曾經兩次到過都城，我因此便問他 總理當日來到此地的情形如何？他歎了一口氣，好似不勝感慨地說道：「啊！總理太好了！你們這樣的『後生仔』那裏比得上！」

我對他說話的語氣，心裏怔了一下，好似這老頭子在對我開教訓。我問他：「我有什麼事情做錯了，使得你這樣生氣」？他繼續的說道：「總理當日到來的時候，我們的同志只有七個人，我們一起都到火車站去歡迎他，如像前日歡迎你一樣。我們也爲他預備好一間房子在你現在住的太子飯店，可是 總理走到飯店門口，知道了這件事，便堅決的不去住。總理很客氣的對我們說：『謝謝你們的好意，你們的錢來得很辛苦，應當捐給我革命救國，不必浪費在這種地方。』這位老同志言下似說我不應當住在那間太子飯店似的，我的心也頓時感覺不安起來，臉上也似乎在發燒似的。我勉強再追問他 總理不住那間旅館，他又到什麼地方去住呢？這位老同志好像覺得有點對我過意不去，他把酒舉起來和我乾杯，然後很委婉的說道：『我們當日準備下這個考究的旅館，爲的是他是我們革命的首領，他要和外國人士接洽事情，並且要和黨外的人見面，場面壞了，不大方便。但是這些理由都不能改變他的態度，他最後告訴我們願意到我的洗衣店去住：一來可以省錢，二來可以和我們住在一起好商量事情。我們聽他如此說，也就只好依他了」。

吳老同志說：「洗衣店裏氣味大，地方又小，而 總理住在那裏倒很舒適。」老同志又說：「總理到都朗杜，上身是西裝，下面是一件有條紋的黃絨便褲。我們覺得 總理的這樣穿着雖然也很整潔，但是總覺得與他身份不甚合式，所以我們強迫他縫了一套西裝，事後他仍然是對我們說：『你們的錢來得辛苦，何如用來革命救國，不必浪費在我的穿衣上面。』」

這兩件關於 總理的小事，我聽了之後當時雖覺得有趣味，但並不感到這些小事對他在取得華僑信仰，來成

就他的革命事業上，有何深遠的意義，一直到了民國十三年，我回到廣州之後，才由另一故事，發現其中的道理：

中國革命的空軍中，有一位先烈名叫楊仙逸，他出生地爲檀香山，依美國的法律，他應爲美國的公民，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經參加美國空軍在歐洲作過戰，在大戰之後回到廣州來參加革命，擔任大元帥府第一任航空處處長。他是在民國十二年討伐陳炯明的時候，死於東江梅湖一個地方，是因船上炸彈忽然爆炸而身死的。在抗日戰爭未爆發之前，每逢他殉難這個日子，年年都要舉行紀念，有如今日我們紀念八一四空軍節一樣。

據說有一次，他年老的父親自檀香山寫了一封信給他，同時信內還裝了一張兩千港紙的滙票，在信中說明這兩千元港幣作爲如下的分配：

- 一、以五百元送給孫大元帥作零用錢。
- 二、以五百元給楊烈士的母親，也即是這位老華僑在中國的太太。
- 三、五百元給楊烈士的妻子和老華僑的孫女們。
- 四、剩下的五百元給楊烈士自己作零用。

楊烈士讀完這封信後，深深感到奇怪，於是把這封信的意思，告訴他的朋友，並哈哈大笑說道：「我們老太爺真是一個大傻瓜，滙來兩千元港幣還要叫我送五百元給大元帥做零用，好像大元帥五百元港幣都沒有一樣，這真是大笑話！」

後來楊烈士的朋友把這件事轉告我，那時離楊烈士殉難的日子已經一年多，在轉述這段往事的人倒沒有特殊的意思，而在我聽了之後，把我在加拿大所聽到的，那位老同志所說的兩件小事連貫起來一想，才發現楊烈士的

父親要給大元帥零用錢的真義所在。也使我恍然大悟，華僑爲什麼肯始終如一的拿出錢來幫助 總理革命，而不防備 孫先生騙取他們金錢，如像康有爲那般人一樣，原來這位老華僑的心理，據我的推測，他心目中的孫先生雖然是做了大元帥，照他平日常苦奉公，不浪費公家財物的習性上說，是不會有錢來作他私人的消耗的，所以特別要叫他的兒子送五百元港幣作 孫先生的零用。

以上這些極其平凡而瑣屑的故事，今日回憶起來也就够我們反省和效法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